



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32～352号，是新四军军部诞生地，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等在此召开新四军领导干部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以及文化巨星郭沫若都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纪念馆内复原有叶挺、项英、郭沫若的办公室兼卧室，以及政治部、副官处、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举办《汉口新四军军部历史陈列》展览。

（图、文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提供）

目 录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陈邂馨

顾 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心耀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陈 光 朱向梅
杨 华 李修文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 鹏 甘 琼 龙桃仙 吕照清
刘重武 陆建军 陈立新 郑学军
姚四平 曾艳红 谢受贵 窦 梅
潘红莲

主 编：陈国方

副 主 编：华 蕾

本期责任编辑：游 迎

编 辑：张川蕾

封 面 设 计：王 鹏

红色印记

<<< <

- 4 战火纷飞中的点点记忆——王应絮回忆在八办
工作的日子 / 杨 轩

文化传承

<<< <

- 9 光阴的故事 / 任本荣（口述） 王炜佳（整理）

商聚汉皋

<<< <

- 12 江右商帮 行者无疆 / 张国勤（口述） 周 婵（整理）
16 我的创业经历 / 陈柔先（口述） 杨贵萍（整理）

精工匠心

<<< <

- 19 我是一个“抹布”书记 / 胡明荣（口述） 白爱萍（整理）

武汉文史资料

WUHAN CULTURAL & HISTORICAL DATA

CONTENTS

2021 年第 9 期 (总第 347 期)

山有黄门

<<< <

- 24 在珞珈山幸会大师 / 陈东华
28 歌从天上来——忆韩勋国教授 / 周希正

委员天地

<<< <

- 35 一名会计师的思想成长之路 / 梅佑轩
41 亲历童家湖“阻击战” / 魏云乔

往事漫忆

<<< <

- 44 武汉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三级跳”
/ 杨普社 熊恒多 张 凯
49 怀念谭维四先生 / 冯光生
53 十年沧桑话巨变 珞珈山水水生烟 / 欧阳海龙

人物春秋

<<< <

- 58 辛亥名人胡兰亭和他湖北联中的孙儿胡佑华 / 王 立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7

(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战火纷飞中的点点记忆

——王应絮回忆在八办工作的日子

◇ 杨 轩

1937年筹建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而中共中央长江局则是与其共同办公的秘密机关。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博古）、叶剑英、何凯丰以及陈绍禹（王明）等都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住在这里。王应絮作为当时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汽车驾驶员，陪同长江局领导共同经历了那一段艰苦而又伟大的历史。而我有幸通过整理王应絮的回忆录手稿，进一步加深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革命无私奉献的大无畏精神。

王应絮这个名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很陌生，在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可能偶尔会出现，因为他是一名普通的司机，可王应絮的司机工作岗位却不平凡。1937年之前，王

应絮在南京新京汽车行开出租车。1937年，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随后王应絮被南京八办聘用为司机，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为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办事处的领导开过车，陪同他们走过了许多艰险而又充实的路程，也为他自己留下了一辈子最为美好的回忆。

初遇

20世纪20年代，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王应絮为了养活自己，进入了车夫这个行当，正是在这个行当里所感触的种种悲惨境遇，使得他在接触过中国共产党人后很快就爱上了这个集体，并被共产党人的温暖所感

动。特别是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使他深深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即使当时许多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事，也都让他难以忘怀。

在他的记忆中，每次有中共代表团的出车任务，领导们都是自己动手开车门，没有当时国民党官老爷的派头，下车时也都是自己带走垃圾、关好车窗。当时汽车质量不好，有时候发动不起来，叶剑英就亲自用手摇柄去发动汽车，而这些都是他在遇到中国共产党人之前所不敢想象的。

如果你不了解旧社会里车夫的地位，就无法想象一些小事对王应絮的冲击有多大。有一次，他送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三人外出办事，因跑的地方比较多，不知不觉就忙到中午吃饭时间了。他将车停在一家饭店门前，准备在门外等领导们吃完饭再回八办，没想到三位同志都在门外等他一起进去吃饭。按照当时出租车车行的规矩，达官贵人上饭馆时，司机只能在门外等着，是不敢进去的。但周恩来硬是把他拉进了饭店，还亲切地说：“怎么能叫你饿着肚子开车呢？”即使上了餐桌，他也感觉很拘束，因为当时一个车夫能和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一张桌子吃饭，说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三位领导看他放不开，就不停地给他夹菜，周恩来还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吃饱。餐食虽然简单，可他内心却被共产党人平等待人的态度和行动深深打动。

这些小事，对于王应絮这个旧社会里的车夫来说，就像在平静的湖面砸下了数块巨石。虽然才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数日，他已经舍不得离开八办的同志们了。恰好当时



1938年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有爱国华侨给八办捐献了一辆汽车，李克农找到他问愿不愿意到办事处为周副主席开车，他毫不犹豫辞掉了车行的工作，正式成为了八办这个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

前往

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的腐败和对战局指挥的不利，中共中央已开始未雨绸缪。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同志回湖北工作，主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湖北（主要是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开展民运和统战工作，筹备成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上海，直逼南京。国民党各重要部门纷纷内撤，当时办事处工作

人员也决定分两批撤到武汉，并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

日寇逼近，南京城内一片混乱，交通完全瘫痪。虽然南京八办已决定撤离，但仍有大批民主人士和群众到办事处寻求交通上的帮助，李克农和袁超俊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想尽一切办法安排他们离开南京。当在南京八办坚持工作到最后的七位同志（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袁超俊、吴志坚、童小鹏和王应絮）离开时，日寇的炮火已经在南京通西门炸响。王应絮和袁超俊各驾驶一辆小车，沿着芜湖、屯溪、南昌、岸乡、长沙这条线路驶向武汉。

出发时两辆小车已经很破旧了，加上路面常年失修，小车在路上不断出现故障。每次车辆熄火，叶剑英就下车用手摇柄重新发动，他风趣地对王应絮说：“小王，没有我，你这辆车就开不走，要我给它扭鼻子才走。”车在路上边修边走，大家的衣服早已布满油污，可谁也没有抱怨，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态度。在王应絮的回忆中，最令人恼火的是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的层层盘查，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的百般刁难，为此耽搁了很多时间。李克农为了缓解大家的怨气，常常劝诫大家，此刻不同于在南京，要学会忍耐。

经过一路颠簸，到达长沙时，两辆小车都无法再使用了，在叶剑英和李克农的协调下，七位同志分成两批，只托运了破旧小车，带上了简单的行李，就乘火车先后向着武汉再次出发了。当他们到达武汉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底了。

见证

南京八办迁到武汉后，在原日租界128街89号的大石洋行（现汉口长春街57号）

大楼内办公，门前挂牌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表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汉的工作地点。大石洋行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被遗弃，因为怕日本人撤离时在建筑物内埋放炸弹，国民党各机关都不敢在那办公。南京八办工作人员转到那里时，还在里面发现了地道和不少枪支弹药等物资。通过地道里散落的文件判断，那里曾经是日本驻武汉的特务机关。

武汉办事处的房子比南京的大，里面工作人员也比南京的多，除南京办事处原班人马外，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和王明、博古等人，人多了，工作也更忙碌。

周恩来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王应絮的印象中，周恩来事必躬亲，忙着与各界、各方面的人士打交道。周恩来的生活十分简朴，刮胡刀片是用了再磨，直到不能磨了为止，牙刷和毛巾用得都烂了、破了还在继续用。他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将军衔，国民党当局按规定发来一套呢子军装和一双皮靴，可他立即退了回去，仍穿着布军装到政治部办公。国民党军政机关每周一都要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每到这天，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是西装革履，秘书、警卫前呼后拥，非常“气派”。而周恩来依然简朴着装，他的这种生活作风就连一些国民党将领也十分敬佩。为了处理好中共和各方的关系，他常常四处奔波，从白天一直忙碌到深夜。很多次王应絮在凌晨两三点将客人送走后，回来时发现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是亮着的，有时候一直亮到天明……

邓颖超当时身体不好，还经常在外为革命工作奔忙，有时一天要外出办事好几次，但她一次也没要过车子。遇到车子空着时，王应絮主动要求送她，她都婉言谢绝了，

生怕耽误了周恩来的工作。办事处内其他同志外出办事基本也是步行，因为办事处只有从南京带来的两辆破旧小车。去国民党的机关办事，步行进去会遇到更多的刁难。为了节省时间，小车基本上都用于进出国民党机关和机要交通。

廖承志对办事处工作繁忙程度和车子数量不足的状况深有感触。他在武汉八办工作一段时间后，按照中央指示去香港开展工作。王应絮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经过一个铁路交叉口时，由于工人疏忽未放下栅栏，等看见火车时已经快撞上了。虽然通过紧急制动避免了事故，但小车又熄火了。为了赶飞机，王应絮和廖承志只好轮流用摇杆发动汽车，幸好在最后时刻赶上了。上飞机前，廖承志郑重地对王应絮说：“小王，这辆车太旧了，你好好干，等我想办法弄辆好车来给你开！”他到香港后做了大量宣传和动员工作，广大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信念所感动，纷纷捐钱捐物，为武汉八办添置了一辆1938年产的“福特”牌汽车和两辆救护车。当时《新华日报》还对此事有过详细报道。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除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输送各种物资外，还有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革命输送人才。在王应絮的回忆中，李克农将招收的大批先进青年安排送往延安去学习或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学习或参加革命工作的总人数已无法进行精确统计。据当时在武汉八办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汉八办介绍经西安到延安的人数即达880人之多。有很多人后来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重要骨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或各条战线的专门人才。许多老同志今天都以一种感



抗战时期的周恩来

慨的心情回忆说，当年是武汉八办帮助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王应絮的回忆中，钱之光是武汉八办的处长，负责后勤工作；袁超俊等负责交通运输工作。他们两人杂事最多，工作最不显眼，外出办事经常都是步行前往，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不可缺少的工作。童小鹏负责电台通讯工作。当时，机要电台一般都设在秘密地点，并且只能在夜深人静时工作。工作劳累不说，在那个针对共产党人的暗杀时有发生黑暗世界，就是在来往电台的路上都要冒着生命危险。

虽然当时工作条件差、物资匮乏，可办事处对待每一位同志都是十分关心的。王应絮有一次住院，正蒙着被子休息时，感觉到被子被轻轻拉开。他一下子警醒，翻身看到叶剑英、李克农、廖承志三人特意抽空来探望他。廖承志紧紧地握着王应絮的手，三

位同志不断地安慰他，要他好好休息，安心治病，临走时还留下两个大苹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苹果已经算是奢侈品了，而王应絮也将这份感动一直深深藏于心中。

撤离

1938年10月初，日寇已逼近武汉，国民党军政机关早已撤离，形势十分危急。迫于形势，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开始转移，由袁超俊等具体负责转移家属工作。他们从汉口向湖南湘乡转移，除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们有一辆破旧大巴外，其他人都是步行。家属转移后，形势更加危急，来办事处求助的人越来越多，连周恩来都参与到接待工作中来。他对同志们讲：“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想到群众，撤退要走在最后。”

在多方协调下，李克农和袁超俊通过社会关系租用了一艘轮船“新升隆”号，专门运送群众转移至后方。轮船启程时周恩来和李克农还特意去探望了大家，但这艘船离开汉口不久就遭到日寇飞机攻击，被炸沉在湖北嘉鱼附近。这是日寇侵略我们的有力铁证之一。

10月25日凌晨，王应絮与办事处内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叶剑英带领下准备转移，同时，李克农和童小鹏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电台分散转移到其他秘密通讯地点。直到深夜，办事处的转移准备工作才完成。伴着日寇的隆隆炮声，办事处全体人员连夜转移到法租界，在万国旅馆稍作休整后，趁着夜色的掩护离开了武汉。

1938年的中国，国运多舛，风雨飘摇。在沉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心中都燃烧起炽热的救亡图存之火。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从1937年10月

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积极为八路军、新四军筹备粮饷和各种军需物资；输送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和各抗日前线；接待国内外各界人士，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王应絮同办事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带领下，满怀救亡图存的赤子之心，为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战争的脚步已渐行渐远，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和文博工作者，我们沐浴着党的雨露，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茁壮成长。虽然我们不用像先辈们那样去经历战火、苦难和生离死别，但是我们应该不忘先辈的事迹，弘扬先辈的精神，将他们的红色故事和光荣历史传承给下一代，让这些精神印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做一个光荣的革命后继者。

（杨轩：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工作人员）

光阴的故事

◇ 任本荣（口述） 王炜佳（整理）

汉绣，荆楚大地孕育出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沐浴着巫风楚雨而来。早在《楚辞·招魂》中，楚人就不吝赞美之词：“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翫阿拂壁，罗幃张些。纂组绮縠，结琦璜些。”到如今，湖北荆州、随州等地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楚国丝织品上，我们还能看到汉绣最原始的形态。

据载，清嘉庆年间，刺绣、成衣、戏衣等手工业作坊遍及武汉三镇。积玉桥、营房口、塘角都有绣坊、绣局、绣货铺。同治年间，在汉口长堤街首先有了郑双茂、郑元茂绣货铺。光绪年间，因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汉口万寿宫江西会馆（今武汉市第七中学所在地）对面的万寿街以及长堤街、满春街一带有做绣货的店铺、作坊约 32 家，随后逐渐形成了绣花一条街，故名绣花街，现

如今武汉市第七中学对门还保留着绣花街的旧街名。当时汉绣行帮在店的技工有 500 余人，连同白沙洲、塘角等地家庭绣工共计 2000 余人，形成了庞大的队伍。因其地依城临江，时有“男会驾船、女会绣花”之说。

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绣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任本荣，是从绣花街走出的最后一位老艺人，下面就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和绣花街的故事。

我的祖籍在黄陂任家大湾，后来迁至武昌青山镇招贤乡张公寨。曾祖父就是绣花街的手艺人，我们家是一个典型的汉绣世家。那个时候，汉绣讲究传男不传女、传媳妇不传女儿，因此家中父兄叔伯 10 余人都以汉绣为生。我的父亲任祖顺最擅长的是成装，他看得多懂得多话却不多，往

往只会在关键时刻点拨我，是我学艺生涯的指明灯。

我出生在绣花街的过街楼上，1938年日军侵占武汉时，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离开绣花街回到青山镇招贤乡。1943年，美国飞机轰炸了修建在绣花街对面的日军仓库，爆炸殃及了整条街。雕梁画栋的绣货铺连同无数的汉绣精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绣花铺、轿彩铺彻底关门，行业中的工人全部都解散了，一帮汉绣艺人在逃难中或改行转业或回家务农。1945年日军投降后，汉绣、轿彩、灯笼、纸扎业第三代和第四代传人以一副绷子、一张桌子、一捆竹材，又开始在六渡桥、长堤街、黄陂街一带重新开业。绣货铺集中在万寿宫万寿街，先后大约有12家，其中有4家保留着老招牌：胡源利、黄开茂、涂添盛、张义顺；新开铺子有8户：涂添泰、戴美萱、绍庆昌、黄永兴、郑复昌等。自此，汉口绣花街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生机。不少绣货铺客源充足，绣品供不应求，其中老商铺“胡源利”因老板胡品阶既懂技术，又雇有一批技艺精湛、较有名气的师傅，技术力量雄厚，分工明确、管理得当，生意最为兴隆，位居同行之首。

在乡间读了5年私塾后，父亲劝我还是学一门手艺比较稳妥，让我跟着大伯去鸭子馆学卤鸭，亦或者跟着他一起做汉绣。可能是由于孩提时代的耳濡目染，我决定学习汉绣。父亲当年一回汉口就在胡源利店铺里搭上案板做成装，并和老板胡品阶商量好，以后就让我在那里做学徒。在此期间，他也犹豫自己在店里，我去那儿到底学不学得好（当时时兴易子而教），直到妹妹因病去世后，父亲终于下定决心把我和母亲一块带回汉口。我就这样开始了学艺生涯。

记不清是阴历八月十二还是十三早上

到的店里，涂阳英（我的师兄，涂添盛家里的小辈）当时正在抹柜台，我就赶忙主动去扫地，就这样开始了每天小心翼翼在木楼梯跑上跑下的生活。绣花铺有八扇木门，每天都是早上卸下来，晚上装上去。这类活都是小徒弟干，我去之前是涂阳英的事儿，我来之后自然就落到我肩上。最开始我连门板都扛不动，还需要父亲帮忙搭把手，随后也逐渐做得得心应手。每天的杂活儿做完后就看着师傅们绣花，第一个接触的师傅就是张中秋师傅。他留着翘翘的胡子，每天穿着长袍。白天他做事我就站在一旁看，看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开始教我绣花，从怎么上绷子，到怎么拿针怎样绣。每天晚上天还没黑透，我就在睡觉的案板上拿画粉照着花样勾勾画画，就这样度过了一段简单却很快乐时光。

汉绣讲究“一画二绣三收拾”。“画”就是设计，不仅要考虑图案的寓意，也要考虑到针法的运用；“绣”顾名思义是通过针法表现图案；“收拾”则是大量装饰针法的灵活运用，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写字算是“画”里最简单的一步，汉绣题材大多取自百姓们都熟悉的故事，内容充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有的是取谐音，有的是寓意。譬如莲花和鹭鸶的画稿里，题字多会写上“一路连科”，寓意仕途顺利。我正式开始学习时首先学的就是写字。因为读私塾那几年打了底，我最先临摹的就是颜真卿的字，后来在师父的指点下，才改用更适合绣面的魏碑体。字体理清后，也并不急着学画，而是继续上绷学习针法，不见得要求手艺赛过师傅们，但起码要熟络针法与走势，师父常说：“只有针法了然于心才更知道该怎么画。”日复一日做着看似相同的事我也并不急躁，因为心里清楚一幅图案复杂的

汉绣作品，从设计、配色、打样、刺绣、裁剪到最后装裱成型，至少要花上两三个月，精致些的要上半年甚至更久，如果没有耐心，可别想做好这一行！

汉绣用途主要有四大类。第一大类是民间民俗、婚丧喜庆、各种庆典的用品。第二大类是汉剧十大行当的戏剧服装，汉剧历史悠久，有着“宁可穿破不可穿错”的说法，在设计戏剧服装时必须考虑到角色本身。第三大类是宗教文化用品，分佛教、道教，宗教类的图案也是十分有讲究的。第四大类是灯会庙会用品，这个也是讲究颇多，不能犯忌讳的。所以干这一行还须懂不少相关知识，绣出来的作品要让大家看着高兴、挂着吉利。除了我的师父胡品阶之外，店里负责设计绘画的杜班芝、主管配色的汤景堂和绣花师张中秋等几位师傅都给我带来深远的影响。

绣花街每天热闹得很，家家户户都挂满了绣品，晚上八九点才关门。戴美萱店里的邵师傅绣花绣久了觉得疲劳时很爱唱戏，他们在绣花街8号，经常唱得我们绣花街22号的人都能听到。不过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还是要属春节。根据行帮的老规矩，腊月二十四吃年夜饭，吃完就放假回乡。因为辛苦了一整年，往往年夜饭都非常丰盛，在这一天给店里做包活的师傅们也都会来。所谓做包活，就是把绣品带回家，做完再给工钱。这些做包活的男工师傅们也都是在绣花铺里做过学徒，由师傅们手把手教出来的。他们吃过年饭后，就带几块绣片回去，一直做到端午节再拿来算账，有的甚至会到八月十五才拿来。以前讲究一年三节（春节、端午、中秋），因为时间间隔长，交通不便利，所以师傅们一次性拿的活会比较多。其实在城里也是有绣工师傅的，绣的大多是些毛坯

活，一般像法衣、戏衣、中堂字画这一类的拿回来都要再收拾。这里的讲究可就多了，不管是铺、压、织、锁、扣、盘、套这些手法，还是荞麦壳、人字甲、万字锦、灯笼梅花锦等装饰针法，在当时都属于传男不传女的“核心技艺”。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不少技术活儿只能由男人来做。设计、下料、配色、人物开像（绣人物肖像时最传神的那几针）全是传男不传女的，甚至复杂一些的针法也只传媳妇不传女儿（女儿嫁出去就是外姓人）。画面经过一番“收拾”，会显得层次丰富，针法富于变化，色彩富丽堂皇，更好地凸显汉绣的装饰性。

按老一辈的思想，把孩子送去学手艺，也只是希望孩子能有一个谋生技能，将来可以养活自己。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人能在有一定综合素养的基础上从容地做选择，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想从事的行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希望大家珍惜光阴不负韶华！

（任本荣：汉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炜佳：汉绣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江右商帮 行者无疆

◇ 张国勤（口述） 周 婵（整理）

“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

“江右商帮”的精神内核经过千百年的演变，深入到了每一位江西人的内心世界，无论是经商创业，还是为人处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像我一样背井离乡的上饶人。

从学徒到创业者，从白手起家到独挑大梁的民营企业家，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取暖的商会领航人，我是这一路的践行者。

以梦为马 创业湖北

1991年，刚刚技校毕业的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上饶，远赴深圳打工。“我是家里的老大，必须扛起老大的责任，扛起六兄妹的生计，帮父母解决负担。”在当时的情况下，

我的想法十分单纯，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里的弟妹们带出来。

记得两年后的一天，因为技术过硬，我被派去催收一单棘手的应收账款。当时，顾客觉得产品故障比较多，不愿意付款，于是厂里让我去解决售后问题。我在解决自己厂产品问题的同时，也顺便解决了其他供应商的故障产品问题。结果客户不但把欠款一次性结清了，还跟公司要求以后不用别人来对接工作了，只要我过来。

机缘巧合之下，我由工程师变成了厂里最懂技术的销售负责人。

1997年，新公司的湖北市场整体运营情况较差，本属深圳市熊猫音响有限公司北区负责人的我觉得这种困局不仅是考验，更是机会。于是，我毅然接下湖北市场，成为

熊猫音响湖北片区负责人，这也拉开了我创业的序幕。

“顺境时不懈怠，逆境时不沉沦。”这是创业期间我时刻勉励自己的话。来到湖北后，我一路披荆斩棘，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版图。到了2002年的时候，熊猫音响的市场份额以每年50%~100%的速度递增，好的时候公司能赚到回款额的30%，湖北市场更是一跃成为全国市场的领头羊。每每回忆起那段创业时光，我心里依然涌动着澎湃的力量。2005年，我出资49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9.6%，正式成立了武汉诚友电子有限公司。

凭着这一次原始积累的过程，我对商场有了自己的理解，也更加自信。这些经历造就了我，也让我开始思考转型和更长远的发展。

江右商帮 行者无疆

我在回忆自己故事的时候，“诚信、吃苦、义气”三个关键词不时闪现，这大抵就是“江右商帮”无形中散发的最浓郁气息。

据传，在往昔的江西移民中，以身怀技艺的手工艺者和商人占比最大，他们常年来往于江西与湖广地区，或者干脆长居外地，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商人集团。其中不乏赣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最具盛名的当属汤子敬。和叔父远赴外地的他，仅仅怀揣600元盘缠，挟着一把雨伞和一双布鞋，最终成为当时西南地区的首富。和汤子敬一样，许许多多的上饶人走出家乡，用亲身经历再续了“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的故事，我也不例外。

在熊猫音响退出市场之际，我试图开始转型做连锁。还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控好



武汉市上饶商会会长张国勤

上游市场，直接导致了项目的流产。可见，一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就跟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然后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果这些价值判断是对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可以为这个社会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这就是上饶人吃苦耐劳、百折不挠、敢闯敢拼的精神面貌。

除了连锁，我尝试过很多产业，包括做煤炭。我认为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在不断的尝试中我才能更准确地找对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处事风格：要专注、极致、持续地发展，不要在快速发展中让自己的战略发生漂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想得周全，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虽然这种作风也有弊端，

它会让事情处理得比较保守，但好处在于让整个团队行进得更稳健、不冒进。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2009年，我抓住机遇，开始做起飞利浦产品湖北地区的代理。众所周知，飞利浦是驰名中外的国际电器品牌，其小家电产品在全球排名第一，彩电产品在全球同样拥有历史悠久的品牌形象和美誉度。代理飞利浦彩电、小家电全系列产品，让武汉诚友电子有限公司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几个弟弟慢慢成长起来，自己的公司也有了得力的帮手。于是在2015年，我开始考虑自己肩上的另一付重担——团结在汉上饶人，建立武汉市上饶商会。

商会协作 反哺社会

比起创业，建立商会于我而言责任更大，担子更重。我创立商会的初衷是希望

通过商会，让在汉创业的上饶人可以互相帮扶。大家都是白手起家，彼此都不熟识，散落在武汉的各个角落各自打拼，如若有人扶一把，这会让很多人走得更顺。除了创建商会这个家，我更希望被商会帮扶的这批人能够在成功之后同样反哺商会，再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这个传承的精神是我们最为看重的。

于是，在我和一众上饶人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5月18日，武汉市上饶商会正式成立。经过多年的发展，商会会员由40多位发展到100余位。商会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形成家庭的氛围，并通过投资公司建立起信任体系。

武汉市上饶商会有三大特色：一是信用，让一些虚假和泡沫的东西不复存在，把大家的实力和优势显现出来，以利于展开合作；二是互帮互助，会员遇有任何困难，不会再人单势孤，有团队和家的力量，就有安全感；三是抱团发展，让小圈子变成大圈子，这样好的

项目便可介绍到商会来，通过商会的资金平台，让信息得到更大的价值体现。6年间，我坚持年年开展商会会员企业诚信评比，既要守住义，又要守住信。这是商人的准则，更是武汉市上饶商会的铁律。



2021年4月，武汉市上饶商会在武汉科技大学黄家湖校区举行助学金颁发仪式



2021年8月，张国勤（左四）参加武汉市上饶商会会长轮值活动

除了对会员有一份责任，我们对社会也有一颗爱心。商会成立之初，我就设立饶商公益助学金，并与武汉科技大学合作，每年向20位在校的饶籍贫困大学生颁发6000元助学金。此外，还会通过走访学生老家，真正做到公益到家。有商会在的一日，这个活动就会坚持一日，形成上饶商会的特色。

国外有百年商会，我们上饶商会也要延续传承。我现在的目标是把投资公司做好，换届的时候我也可以更放心地交出去。自从成立了武汉市上饶商会，我就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商会和投资公司上。

未来，我希望商会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我们还在努力引导更多饶商参与到共同建设之中，坚守信用，发挥自己的优势，整合资源。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今的饶商是湖北乃至中国商界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千千万万的上饶

人来自一个共同的地方，正在用自己的精神写就不平凡的传奇。

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张国勤：湖北饶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诚友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上饶商会会长；周婵：武汉市上饶商会副秘书长）

我的创业经历

◇ 陈柔先（口述） 杨贵萍（整理）

我叫陈柔先，是一名温州商人。自1997年创业至今，我始终一步一个脚印，和公司一起成长壮大。从砥砺奋进的创业之路，到铁路行业的业内翘楚，再到初心使然的公益行为，不屈不挠的坚持，成就了我今日的事业和人生。

酷暑盛夏时，我曾在滚烫的铁轨旁勘察现场，凉鞋被烫化满脚起泡；冰天雪地时，我曾拿着自己的产品做展示，一脚踩空掉进雪坑摔成骨裂……从商20余年，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不是那些高光时刻，而是创业过程中的一些“窘事”。

从“门外汉”到标牌行业黑马

记得高中还没毕业，我便进入父亲的电器厂帮忙，掌管财务。后来，因为生意走下坡路，我便想着转型。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一批老乡在外面做标牌生意，貌似还不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虽然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标牌行业，但我决定试一试。于是，我翻开中国地图，在上面做了许多记号，并最终圈出了武汉。因为武汉是中部最大的城市，又是全国铁路枢纽，我觉得发展空间比较好。

1997年，25岁的我只身来到武汉，在武昌老火车站对面租了一个20平方米的店面，开始了创业之路。因为入行晚，面对复杂的招投标程序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我接连败下阵来。每当上门推荐产品吃了闭门羹，我都会躲起来偷偷抹眼泪。但哭过之后，因为自己的犟脾气，又会迎难而上。

在不断被拒绝之后，我开始用堵门的“土办法”。铁路管理部门的人上班早，而且不坐班，开完早会就去一线，所以我每天天不亮就拿着产品等在门口。

足足守了半个月，我的举动终于引起一位分管领导的注意，问我：“是不是要反映什么问题？”我说明来意后，这位领导被

我的坚持所感动，答应把产品寄给国家铁路部门进行质量鉴定。

经过几周时间的等待，我如愿拿到质量合格证书，正式入行成为竞争者之一。为了在行业立足，我简直成了“拼命三娘”，每当接下一个订单，都会不厌其烦地去勘查现场，以期产品的匹配度达到最高。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对标牌产品质量近乎严苛的管控，华力达标牌在行业内的美名日渐传播开来。短短几年时间，华力达标牌作为行业里的一匹黑马，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壮大，“华力达”也成为了业内人尽皆知的优秀品牌。

乘高铁发展之风实现跨越式发展

2009年，武汉至广州的高铁开通在即，标牌企业都盯上了这块大蛋糕，想在第一时间抢占高铁标牌的制高点。

我也不愿意错失这次机会，于是便冒着近40℃的高温去高铁沿线考察。烈日暴晒下，铁轨旁的石子路烫得冒烟。1个小时不到，我的凉鞋被烤得变形，满脚走出了水泡，痛得就像针扎一样。行外人觉得铁路标牌很简单，实则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特别是高铁沿线的产品。以前我们的原材料依赖进口，成本很高，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花重金组建人才团队，坚持自己搞研发。

正因为一次次的现场走访和不断研发，我攻克了高铁标牌的多个难题。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可以和进口产品平起平坐，甚至比进口产品更好。即便是在高铁300公里的时速下，路边的标牌依然能保持“纹丝不动”。“人无我有”的优势，让我的公司声名鹊起，各地高铁订单纷至沓来。

2012年冬，我受邀参加哈尔滨至大连高铁标牌招投标，却意外铩羽而归。哈尔滨高铁路段的天气十分恶劣，夜间最低气温可达零下40℃，还伴有大风。产品试用后，没几天就冻裂了。我不信邪，半年间十几次往返哈尔滨和武汉，与技术人员在雪地里不断测试标牌质量。

一天凌晨，我搭乘一辆出租车独自去看现场。当时气温零下几十度，我穿着普通冬衣和薄靴就去了。司机说太危险，坚持不让我下车，最后我只好跟司机约定，如果10分钟没回来，就来找我。

积雪很厚，踩下去没到膝盖，走了没几分钟，我的腿就被冻僵了。头脑是清醒的，但脚却完全不听使唤，定在那里。亏得那位司机比较仗义，将我救了出去。

最终，在更换了多种材料和黏合剂后，产品终于达标。谁料，在进行产品展示时，我一脚踩空掉进雪坑，进医院被诊断为骨裂，三个月无法下地。

我以超乎常人的努力把“华力达”带到了铁路标牌顶尖序列，高铁标牌产品市场占有率也跻身全国前列，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中铁一局至中铁二十五局等多家国有企业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同时，还获得了中国铁路总公司优秀供应商的殊荣，企业营收也突破亿元大关。

迎难而上开启新的征程

都说温州人的精神是“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创新”，我也继承了温州人的这种精神。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的袭来，我立即意识到这将很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技术革命，高铁行业自然也不会例外。经过咨询多位高铁行业和人工智能行业的领导、

专家，我验证了自己的想法，也在了解学习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信心，毅然开启了新的创业征程。

说干就干。我立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合适的研发团队，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了长沙一个由多位博士组成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团队上。凭借我在高铁行业几十年的经验和人脉，以及对高铁行业的热爱和奉献精神，长沙的博士团队被我打动了，愿意加入并共同研发高铁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

由此，我完成了核心团队的搭建，成立富先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铁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研发。短短两年时间，我带领下的富先智能便研发出了多款高科技产品，其中“高铁站消毒喷洒机器人”还获得了中国防疫装备设计大奖。

而今，中国高铁已经从追随者变成了领跑者，我希望能够为中国高铁事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带着诚挚而坚定的眼神，注视着为自己为新的事业描绘的一张宏伟蓝图。

爱心路上的公益人

有句话说得好，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从无做到有，从有做到无”。企业的社会责任一直以来都是我所注重并为之付诸实践的，慈善公益之行，我从未停止。

关爱弱势、反哺社会，是我经商以来一直坚持做的。我深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来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虽然企业家也要创造利润，但更重要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促进社会进步。

2014年8月，我向武汉市慈善总会捐款，关爱残疾人等弱势群体；12月，我带领武汉苍南商会太太联谊会向苍南县慈善总会（春晖基金）妇女“两癌”专项基金捐款。

2015年起，我连续三年为通城一中捐款，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早日成为栋梁之才。

2019年8月，台风“利马奇”登陆浙江，导致永嘉县岩坦镇山早村发生堰塞湖决堤。得知受灾情况后，我第一时间就将善款捐给了灾区的人民，希望帮助他们早日渡过难关。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首先通过武汉市温州商会向受灾同胞捐款2万元，其后又将价值10万元的防疫物资捐给龙港交警队，为抗击疫情尽微薄之力。

从商以来，不管是事业处于低谷还是高潮，无论生意顺畅还是资金吃紧，我都秉承着奉献社会、关爱他人的信念，坚定地走在公益道路上，先后获得武汉市慈善总会慈善企业家、苍南县慈善总会慈善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常怀感恩之心，是推动我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财富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实现社会和企业双赢是我经营企业的最终目标。我会将“常怀感恩之心、常行善意之举”进行到底。

（陈柔先：富先智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华力达标牌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女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温州商会常务副会长；杨贵萍：武汉市温州商会办公室主任）

我是一个“抹布”书记

◇ 胡明荣（口述） 白爱萍（整理）

我是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胡明荣。2020年10月，我获评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七一前夕，我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我是一块红色“抹布”，哪里有困难，我就要去哪里抹。我要抹去居民的烦恼和困难，给他们带来幸福和快乐。

（一）

江欣苑的前身是渔业村。当时的渔业村是一个典型的贫困城中村，地无三尺平、房无三间新，1998年村民人均年收入仅为600元，集体经济负债累积200多万元。

我是从河南嫁到渔业村的。原本一心一意只想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我被领导找上了

门，希望我参加村长的竞选。1999年9月，我高票当选渔业村第一任女村长。

从此，沉甸甸的责任就压在了我的肩头。我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村民。为此，我无怨无悔，在基层一线一干就是20多年。

要想富，先修路。我上任后烧的“第一把火”就是修路。我想方设法争取到多方支持，加上村民的自愿捐助，渔业村成功修建了第一条水泥马路，打开了与外界交流的屏障。2000年，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大胆带领村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庭院经济和立体养殖技术，村民人均年收入一举突破2000元。

同年，渔业村村集体所有的下马湖再生资源回收市场被征用，获得补偿款1700



2016年，胡明荣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多万元。当村里收到第一笔征地补偿款时，村民们兴奋不已，要求将钱分光。我不同意，坚持用这笔钱为村民买社保、医保，发放生活费和发展集体经济。我清楚，将钱分光会带来诸多弊端。我的身边就发生过类似的故事，有的村民将征地补偿款拿到手后就去赌博，输得干干净净；有的村民误入传销组织，越陷越深；还有的村民吸毒，最后妻离子散。可当时村民们并不理解我的苦心，村里不分钱，他们就闹，甚至有人对我进行人身威胁。我顶住重重压力，耐心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曾经的“三无”变成了现在的“N个有”：幼有所育（托育园），老有所依（智慧+居家托老中心），青年人有事可做、精神充实、心情舒畅、荷包暖和。

（二）

2007年，城中村改造，渔业村变成了江欣苑社区。

当时渔业村拆迁，矛盾丛生。面对困难，我没有退缩，带领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上门征求群众的意见，让群众的事情群众自己说了算。同时，我第一个签字，先把自家的房子拆掉。在我和同仁的努力下，当年渔业村的拆迁，创造了全村58天拆迁600多户20万平方米房屋而无人上访的记录。

拆迁后，村民们住进了楼房，成为了社区居民，但思想观念一时还转变不过来。有一句顺口溜形容刚刚“村改居”

的江欣苑居民生活：“打牌日当午，反正没了土。不愁盘中餐？吃喝找政府！”因为不思进取，导致本来已经“失地、失业”的村民生计无法保证，给社会造成极为不稳定的隐患。

说一千道一万，还不如干一件实事；千条理万条理，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带领党员干部一班人，“下湖捕鱼、上岸跑市场”，寒冬腊月，我骑着三轮车，亲自到武泰闸农贸市场卖鱼……

为了使社区“活”起来、“动”起来，我想了很多办法。每天早上6点半，我都会到社区里走一走、看一看，与居民们聊一聊，这是我发明的“6点半晨步工作法”。通过每天清晨的遇人问候、遇事倾听，我对社区的大事小情做到了一清二楚，工作起来

自然就有的放矢、效果佳。渐渐地，我在社区居民心目中的定位不断升格，由生人变成了熟人，由熟人变成了亲人。

江欣苑社区成立之初，党员群众活动中心只有90多平方米。我把党建引领作为社区工作的核心抓手，多方征集居民的意见、建议，通过民提、民议、民决、民评“四民”工作法，顶住各种压力，最终建成了47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做到阵地建起来、活动搞起来、老百姓的心凝聚起来。

在我的主导下，江欣苑建立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小组—党员—楼栋长—单元长”的“六级组织管理体系”，自上而下一抓到底，点面结合上下联动。社区推出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文体服务、关爱服务、党员服务加特色服务的“6+1”服务体系；推出“微邻里”网格化线上便捷服务，社区干部们用自己的“六心”（爱心、贴心、真心、暖心、信心和耐心），解决百姓的“八不”（不快乐、不满意、不情愿、不配合、不理解、不相信、不支持和不参与），把思想工作做到居民身边。

基层社区工作多年，我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独创“加减乘除”工作法，即增加服务力度、减少服务被动、乘上工作效益、解除矛盾纠纷，让社区居民的事办得迅速，没有梗阻；建立礼社区、义社区、仁社区、智社区、信

社区；成立40多个社会团体；实行“五微”工作法：“微心愿”融合志愿服务，“微公约”融合自治发展，“微团队”融合五务合一，“微项目”融合民意惠民，“微公益”融合全民服务，以“微”见大，让社区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园。

其实，我的这些点子来自于不断的学习。我有好几个笔记本，床头边放一个，每天看电视新闻做笔记；车上放一个，开车听车载广播，抽空记下可用信息；工作室放一个，记录报纸和学习强国上的有用信息，根据我们社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如今，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可谓“大名鼎鼎”，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被中组部誉为全国“村改居”成功转型样本，社区党委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而我本人也被中宣部授予“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胡明荣（左四）与社区工作者坚守一线，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资供应

(三)

江欣苑高龙城非遗传承园是全国首个建在社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我是它的创始人。

如何让失去土地的村民“洗脚上岸”“洗脑进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居民？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居民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放下锄头把、走下麻将桌”，走上创业、就业之路。

我通过多方考察，决定挖掘汉阳特有的高龙文化。2008年，江欣苑社区建起了“高龙博物馆”，汉阳高龙成功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仅仅做到这些是不够的。2012年，我计划以汉阳高龙为载体，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为了引进非遗传承人，我开着车在全省各地跑了几个月，历尽艰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将龙从发木雕船模、任本荣汉绣、刘泥巴剪纸等首批非遗项目引入园区。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此后，江欣苑高龙城非遗传承园不断发挥集群和示范效应，引来众多非遗项目纷纷入驻。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进入，我都亲自把关、全程参与，我还千方百计整合资源、搭建平台，鼓励和帮助非遗传承人走出工作间、走向市场，扩大社会影响力，提高经济效益。如今的高龙

城非遗传承园，是家庭致富的示范基地、湖北省现代服务行业示范园区、千年非遗产业发展示范基地，有近60项国家、省、市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入驻，成功打造出“互联网+党员‘三带’”示范基地，实现线上线下双轮驱动，非遗产品远销国外，解决就业2000多人次，接待国内外游客100多万人次，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内主流媒体和100多个国家的海外媒体数次报道。

社区居民高兴地对我说：“胡书记呀，你把古书里的文字变成了产业，把古墓里的木乃伊弄起来跳上了芭蕾舞，让我们这些没有很高文凭的人都成了文化人。”

(四)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武汉。年近60岁的我，曾做过两次癌症手术，属于高感染人群，以我的身体状况应宅在家里，但我不能。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



2021年6月，胡明荣（右一）与非遗传承人畅谈非遗传承及保护工作

一名社区党委书记，我不但不能退后，更应践行当初面对党旗举起右手入党宣誓时的誓言。

我与社区干部、下沉党员、志愿者一起，筑牢了社区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我忍受着胸口疼痛，每天早上8点之前把管辖的四个居民小区全部走一遍，再部署当天工作；我给辖区居民打电话询问身体状况，叮嘱他们勤洗手少出门；我穿梭在小区的楼宇之间，为困难居民、独居老人送菜和生活用品；我的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解决辖区居民、患者的各类问题。在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我几乎四天四夜没有合眼，不停地接打居民电话，最多的一天接打了600多个电话，后来喉咙咳出血来，声音嘶哑。

最让我操心的还是江欣苑社区近万名宅居中居民的吃喝问题。社区及时成立了爱心志愿服务队，每隔三四天就会给辖区内5471户居民送一次菜和生活物资。爱心企业给社区捐赠了15万元，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我带队到白沙洲大市场采购生活物资，与供应商讨价还价大半天，口干舌燥。便宜十几元钱，我又能为居民买一大把蔬菜。看着车上一包包菜品和生活物资，我感到很满足。我还拖着沉重疲惫的身躯，到武湖农场采摘新鲜蔬菜，一摘就是七八个小时。

疫情期间，我开着自己的私家车送了16位病人到医院、隔离点，最后这16位居民都康复回家了。有人问我：“你怕不怕？”我说：“我怕，但接到居民求救电话的那一刻，我只想着救我的居民。我是江欣苑的大家长，我只想把这个大家庭的每个人都护好。”

“你是社区的一块抹布，你带动13个群众服务队，每天给社区消杀。你是社区的

守护者……你是群众身边的行走护士……你是患者生命的抢救队，你电话打爆，嘶哑的声音直通街道和政府抗疫部门……这个冬春很冷，封城的日子也蛮难熬，你对居民说，苦难终将过去，春暖必将花开，居民对你说，你是小巷绽放的迎春花。”这首江欣苑社区居民自发创作的《致敬社区工作者》诗歌，就是对我的最好礼赞。

（五）

习近平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些年来，由于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我的身体不断出状况，常年需忍受病痛；女儿生孩子时，我也不在身边，家人难免有怨言，但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我对不起家人、对不起自己，但我一定要对得起所有居民、对得起社区这个“大家”。居民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满的，我再苦再累也值得。

（胡明荣：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江欣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在珞珈山幸会大师

◇ 陈东华

在我年过半百的岁月中，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每天傍晚下班后，心无挂碍地晃悠在珞珈山的环形步道上，只有自己的脚步和呼吸声萦绕在周围。这时的我，可以全身心地感受珞珈山的丰富和静谧；可以停下脚步长时间地眺望灰中带粉的天空，无所顾忌地与透过高大林木、挤进视线的夕阳对视交流；可以把头昂向天空，闭着眼睛勇往直前；也可以默默地与自己的灵魂对话，与另一个自己交流……自由自在、轻松闲适，在紧张工作了一天之后，这是我最为享受的时光。

当然，也可以边走边想，漫无边际地想，特别是在经过那一片让人无限遐思和景仰的十八栋——曾经“教授中的教授”的住宅，望着那一栋栋历经沧桑、内涵丰富、现已修葺一新的小别墅时，我总会驻足观望，默默地感受着大师们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

过的气息；也总会回想起在珞珈山接触过的大师们的点点滴滴……

曾经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大师们，以学术上的创新创造和不懈的传道授业解惑，让这座山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底蕴。

与著名植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弘远先生的偶遇

杨弘远先生和夫人周嫦都是珞珈山上有名的教授，因夫人中风多年卧病在床，孩子又远在国外，照顾夫人、出门买菜等家里家外的一切事务都由先生亲力亲为。杨先生曾经非常遗憾地说，夫人自生病后，每天最多只能在家门口站站，外面的风景都与她无缘了。

在珞珈山上见得最多的是先生穿着家常对襟粗棉布中式衣服，手挎菜篮子走在路上的样子，平实得如温厚的邻家大叔，举手投足间却尽显知识分子的儒雅和智慧。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最好诠释吧。

每次偶遇先生之后，回到家我必定和儿子唠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相关话题，和他探讨多读书、读好书的好处和妙处，

告诉他什么叫“大家风范”。多读书能让人形成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底蕴和气质，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成为一个做事低调且内涵丰富的人。

杨先生常会独自一人在珞珈山半山腰散步，我经常在那跑步，遇见多了也就成了熟人。在他不赶时间时，我们会随意地聊聊天，聊聊他著作的出版近况和市场发行情况。

有一次，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为什么他的某些著述要舍近求远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很认真地解释道，因为很认可浙大出版社负责他书稿编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他说那位编辑是博士毕业，且所学专业与他的研究相关，对他的著述及学术思想很了解，他们能很好地交流和沟通，合作得很愉快。

尽管知道先生的选择很有道理，可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的我还是出于本能的敬业精神，不断地向他推荐，告诉他武大



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教授别墅群一区1栋，杨端六、袁昌英伉俪曾在此居住

出版社有很好的宣传推广渠道，有很敬业的毕业于武大生物系的专业编辑，离得近、沟通起来更加方便；并且武大出版社的学术著作出版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时我们也会聊聊他的母亲袁昌英。我告诉他，自己刚上大学时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见过他母亲的名字，拜读过他母亲的相关作品，很是敬佩。也会聊到他姐姐杨静远及其所著《让庐日记》，再就是聊聊武大的前世今生。

杨先生总是非常耐心、安静地听我闲聊。对于出版著述一事，他说以后会认真考虑的。之后，杨先生在武大出版社出版了自己重要的学术著作《植物有性生殖四十年》，并荣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也许这与我的“游说”无关，但我仍倍感欣慰。

杨先生出身名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武汉大学教授，195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生物系。他的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

济学家、武汉大学著名教授，1913年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1938年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任迁校委员长。母亲袁昌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知名女作家，是“珞珈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苏雪林、凌叔华）。曾两度出国，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是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武汉大学教授，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出版过《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等著作。

拜访著名美学家、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

刘纲纪先生出生于1933年，1956年，他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应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邀请到武大工作，是武汉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家、美学家。

2006年7月的某天，因先生在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相关美学著作五种（《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传统文化、哲学与美学》《〈周易〉美学》《艺术哲学》《美学与哲学》），这是先生重要著作在武汉大学出版社比较集中的出版，所以社里决定做一期专访进行宣传推广。我与媒体记者一起去拜访先生，在他家聊了三四个小时，有幸与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先生抽烟极为频繁，基本上是一根接着一根。采访完正题后闲聊了一些话题，聊到了美学界的许多人和事。

先生与我们聊了他在北大哲学系的学习经历，与李泽厚先生的交往和友谊；谈到他与李泽厚先生一起主编《中国美学史》的经历，还拿出他年轻时和李先生的合影给我们看；又聊到他的实践美学思想，再聊到当今的际遇……句句真诚实在，不愧是性情中人。

先生说，自己本来1998年65岁时就退休了，之后评上了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又重新开始工作，带博士、硕士研究生。“本来不想再干什么指定性的工作，退休后潜心书画算了，现在教育部拨款让我们搞多卷本《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我只能又开始工作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但任务也是挺重的……”先生很坦诚地叙说着，并不把初



1984年武汉大学樱花节时，刘纲纪老师（左四）与学生走在樱花大道上（照片由王海龙提供）

次见面的我们当外人和陌生人。先生的话语随着烟圈在挂满了书法和绘画作品的不算大的客厅里萦绕，朴实真诚。

我知道先生除了美学研究之外，在绘画和书法上都造诣颇深，也许这才是他退休以后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情吧。随着荣誉而来的，是重返工作轨道的辛苦和责任。不能专心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的事情，可能也让先生略微感到遗憾。

告别先生后，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武大校园中的一件与先生相关的事件。

当时先生的名字在珞珈山就已如雷贯耳了。1985年6月的某天，一张小字报贴在了桂园食堂十字路口的“民主墙”（那时的任何消息都在此发布，从讲座、通告、喜报到电影消息等等）上，好像内容格外吸引人。大家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有的对小字报内容莫名其妙，有的则是会心一笑。

小字报上说的是前一天晚上在教三楼001教室的讲座：“昨晚两个牛皮达子为了达到自己出人头地、欺世盗名的目的，冒用教授刘纲纪的名字举办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美的欣赏’讲座，其实是瞎吹牛，浪费同学们的光阴，我们强烈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一群受害者。”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大家以谈美为时尚的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1981年首版）出版后，在新华书店可是要起早床、排长队才能买得到的，赶时髦的我们几乎人手一册。所以广告打出美学教授刘纲纪的讲座，让我们一个个心潮澎湃、趋之若鹜地去抢占座位了。

讲座7点开始，我5点半就到了。不到6点，能坐几百人的001教室已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好多人自带小板凳坐在教室

的各个能放下凳子的地方——走廊、角落，有的甚至趴到了窗户上。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祈盼着美学大家带来美的享受、精神上的盛宴。

可在我们翘首以盼几个小时之后，教授却迟迟未到，只有那几个不请自来的人在讲台上执着地贩卖着自己的“货色”。

——这就是小字报的由来。据说当时并没有联系到先生。

光阴似箭！

文中的先生们都已驾鹤西去，但他们“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气质、道德文章、风貌神韵却永远留在这座校园里，永远留在怀念他们的人们心中，永远与珞珈山同在；他们的精气神已化作珞珈山的一草一木，永远陪伴着后学后进。

（陈东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3级校友）

歌从天上来 ——忆韩勋国教授

◇ 周希正

“他对声乐艺术无限的热爱，是我们身边的楷模；他是天上会唱歌的星星，将永远被我们仰望……”

华中师范大学韩勋国教授是声乐界的前辈，他擅长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对声乐艺术进行感性的体验，用教育家的人格魅力带领大家对声乐艺术进行理论研究。他在声乐演唱、教学、科研中的造诣让我们敬佩，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老头子”，是我们对他亲昵的称呼，这昵称，包含尊重、亲近、喜欢，甚至有点怕的多重意思。

（一）

读中学时，武汉歌舞剧院曾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圣地。在那里，有驰名中外、头顶光环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那时，每当武汉歌舞剧院有新剧目上演，我们几个学习声乐

的师兄弟都会早早地到剧院后台晃悠，有票也要故意从后台进剧场，目的是为了近距离看看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大明星、歌唱家。因为喜欢唱歌，所以我们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追星。

那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大幕拉开，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幕后传来一阵悠扬熟悉的歌声：“卖布——卖布勒，卖布——卖布勒。”接着，一位身着阿塞拜疆民族服饰的英俊卖布郎来到舞台中间。他的出场立刻成了全场的焦点，充满穿透力的声音、潇洒的舞台表演，让我折服、敬仰。当年，生活中的韩勋国老师与其他同时期的男演员不同，浓眉大眼的他身上自然带有一股阳刚之气。我们喜欢躲在琴房外听他唱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高原之歌》，那抒情的男高音，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可辨。舞台上的韩勋国老师与其他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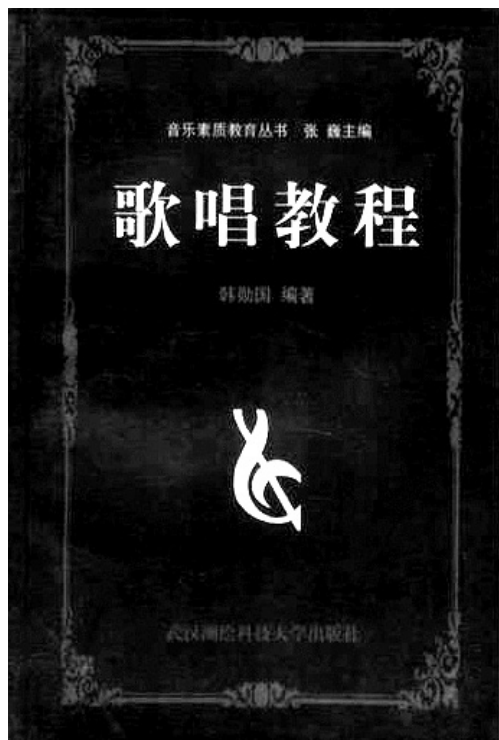
期的演员也不同，他特别擅长将生活化的细节用于歌剧舞台表演，他塑造的歌剧人物让人亲近可信。我们追他主演的歌剧《货郎与小姐》，喜欢他在舞台上那种天人合一的表演气场。韩式的歌剧表演魅力，使我迷恋上了歌剧这门综合艺术。

人生的轨迹仿佛是被命运安排好了似的，我也走上了声乐舞台。1993年，我随武汉市文化交流演出团赴香港演出。我的团友是男高音韩晓彤，一个我很欣赏的演员。在南去的列车上，我们交流声乐演唱的体会，讨论声乐艺术的感悟，他的声乐演唱观点和深厚的艺术功底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原来他是在武汉歌舞剧院大院中长大的，耳濡目染，艺术的品味自然高。我随口问了他一句：“以前有个我很喜欢的歌剧演员叫韩勋国，现在还在歌舞剧院吗？”他直直地看了我一会儿，慢慢地说：“那是我爸爸。”“啊，那是我的偶像呢！”我用惊奇的口气说。就是这样的机缘巧合，为我和韩老师后来的交集留下了伏笔。

1997年，武汉音乐学院举办首届“樱花杯”声乐比赛，聚集了中南片各路声乐人才。东道主武汉音乐学院派出了当时享誉歌坛的精英选手参赛。我作为江汉大学的声乐教师参赛，经过激烈的竞争进入最后的决赛，并最终获得美声唱法亚军。颁奖结束后，我在后台收到一位选手递来的纸条，上面写着：华中师范大学的韩教授让你回个电话，号码是xxxxx。当天比赛后，选手之间相互合影，兴奋点过后由于疲惫我就忘了这事。几天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喂，我是华师大韩勋国。”天哪！前辈、偶像亲自给我这个晚辈打电话，立马让我想起了那张纸条，我忙连声说到：“对不起，对不起，韩老师，我马上来见您！”

当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华中师范大学北区教授楼时，见到了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这不就是那个曾经在舞台上风度翩翩的歌剧王子吗？虽韶华流逝，却多了几分儒雅和从容。韩老师见到我，没有多的寒暄，直截了当地说：“周希正，我听韩晓彤说过你，现又在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厅听你的现场演唱了，想让你在华中师范大学代课，你能够来吗？”当时韩老师担任华师声乐系主任，为了音乐学院的工作能够放下身段主动给我这个晚辈打电话，这份信任让我感动不已。华中师范大学作为一所重点大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我能否胜任教学？当时，我心里还是有点犯怵。

韩老师可能看出了我的顾虑，随即鼓励我：“没关系，你就在我的琴房上课。如果有人质疑你的教学，有我呢。声乐教学应该基于正确的实践基础之上，那些自己就唱



韩勋国教授编著的《音乐素质教育丛书——歌唱教程》

得不对的老师，怎么能够教得出好学生？我认为好老师标准，首先是要在舞台上能够立得住。”谈吐间，说话的语气、节奏、抑扬顿挫的语调，还犹如那个驾驭舞台的歌剧王子，那些正面角色的浩然正气俨然融入了他生活的本色中。我暗暗地想，决不能辜负他的这份信任。从那次直率、简单的见面开始，我逐步了解到曾经远观、仰视的歌剧明星舞台下面的生活。后来共同教学的日子，见证了他依然保持着艺术家的激情，将声乐教学的讲台演绎得丰富多彩，书写了同舞台上一样的精彩的故事。

做代课教师的那一年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它让我有机会清楚华中师范大学声乐教学的特点，感受到这个团队的文化氛围。作为声乐系的掌门人，韩勋国老师面对的是当时扩招后学生人数的暴涨，声乐系的每个老师周工作量都有20多节课，工作压力非常大。而且，综合性大学对教师的科研要求，是悬在老师们头上的那把刀，它是和老师们的职称、晋级挂钩的硬标准。面对教学、科研双重压力，韩老师以身作则，不仅满负荷工作，而且在科研上也做出了许多成果。他说：“制度是公平的，科研考量如果没有严格的规矩，踏实的人一定会吃亏。大家都是这样，压力会激发人的潜能。”

在他的带领下，当时的华师声乐系在教学、科研上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势头。我很希望能够进入到这样的团队中来，所以更加努力地工作，教学一丝不苟，因此得到学生的好评。记得有一次，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韩老师告诉我，在音乐学院的大会上，当时的书记向大家征求关于调我来华中师范大学的意见，大部分老师都表示赞同。他让我好好准备一节声乐公开课。也许是渴望加入这个团队，也许还有那么小部分的反对意

见，在准备公开课的过程中，我始终对自己的教学设计不满意，感觉上课没有平常那么自如，拿捏不准课程安排的节奏。几次想求助于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韩老师，但是他那么忙，我实在不好意思开口。

就在此时，他带了几个学生来到我的课堂上说：“这几个学生你帮我听听，看看是什么问题？”这种非正式的教学，无疑是雪中送炭。在自然放松的气氛中，我和韩老师就声乐教学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您从事声乐演唱和教学这么多年，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教声乐？声乐教学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韩老师露出一个思索的表情，说：“声乐教学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自然’。最高明的声乐教学手段，是经过非常考究的思考，在教学中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调整手段，在歌唱的轻与重的要求中，学生不知不觉能够唱出符合他嗓音特色的自然松弛的声音。这样的教学手段是遵循声乐艺术的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不能带有任何功利心的。”韩老师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为什么我对自己公开课的教学设计不满意，原因在于我的心态出了问题。声乐教学方法的探讨，也折射出做人的道理。这样的入职考核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我人生态度的测试，更是我人生道路的选择。

（二）

在人们眼中，从舞台的辉煌到讲台的淡泊，平凡的教学生涯一定是落寞的。我却不这样认为，理解生活真谛的人，更喜欢繁华过后的那份恬淡，体味来自其中无尽的乐趣。如同韩老师那普普通通的教学，在平凡中留下许多温馨的画面，而我们之间那种亦师亦友的感情，使枯燥的技能课充满了温

情。他那种艺术家的真诚一直都在，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授风采。

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在歌唱中常常带块手帕，韩老师也会在钢琴上放一块手帕，这块手帕可比老帕的那块实用多了。在平常的教学中，韩老师非常有歌唱激情，经常唱得满头大汗，汗珠子挂在他浓浓的眉毛上，这时他会一边擦汗一边引吭高歌。这样有艺术氛围的教学场景，学生方婷应该是记忆最深刻的那一个。

方婷是一个很勤奋的女孩，每一堂课都会详细地记录下上课的每一个细节。尤其是在韩老师示范时，她会反复问：“您的喉咙怎么开？”甚至有一次还拿出皮尺，量韩老师歌唱时牙关节开到几公分。在旁听课的同学都强忍着不敢笑出来。韩老师这时拿出手帕突然做出要揍她的样子，方婷惊愕地看着老师。“对！”韩老师大喊一声，“你吃惊的时候，喉咙就自然而然地打开了。”韩老师说：“声乐是一个感性的东西，你要善于体会自身的感觉，而不是这样理性地把它看作第三方。”

这段教学的细节，是韩老师的学生告诉我的。作为声乐老师，我听了这个故事不禁感慨：真是大智慧，将理性思维拉到感性的学习轨道上来。我想象得到，在这对师生的教学互动中，一定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回忆可以挖掘。方婷的毕业音乐会我去听了，她优异的成绩就是对这段教学最好的肯定。今天已经是高校声乐副教授的她，谈到在华师求学的经历、说起韩老师的时候，眼眶里总会泛起激动的泪花。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袁玥回忆说，韩老师对她学术上的影响、艺术审美上的引导影响了她一生。的确，有几次我们共同参与研究生论文答辩，



韩勋国教授夫妇与学生方婷合影

为了让学生掌握一个知识点，她会反复组织学生进行多次预答辩，还善于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帮助学生论证学术观点。这种开阔的学术视野、踏踏实实做事的方式正是我熟悉的韩式风格。

谈起老师的艺术审美引导，她给我讲起另一件往事。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是韩老师上课布置的一首作品，有一次回课，她刚唱完，老师问：“你知道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吗？了解它所表达的人物和音乐地域风格吗？”袁玥说她当时很认真地观摩了许多名家的演唱并模仿了她们的演唱风格，自己认为演唱得还不错。见到老师质疑的表情，自己愣在了那里。这时老师说：“你眼睛的画面感不对，革命历史题材，革命浪漫主义的插曲，激烈战争中短暂的美好画面。

你的眼睛里要有老百姓朴实的眼光。像你这样眼神飘忽、瞎加装饰音，不是唱的老百姓。是唱的哪些人，你要思考，流行的东西不见得是好的。我不喜欢过度包装，那是艳俗。”

我曾经参与声乐舞台表演课的教学工作，课堂上和学生互动较多，韩老师的学生刘娟惟妙惟肖地表演韩老师在课堂学习法语的情景，那带有武汉方言的法语发音和认真的神态，活灵活现再现了韩老师和研究生们一起学习的场景。韩老师对新知识不断地汲取、对学术的严谨态度、永远没有终点的学习精神，无形地影响着学生。后来刘娟也当了老师，其学生考进了华师，成为我的研究生，同样讲了她们眼中的刘老师是如何认真备课的。为了上好课，刘娟可以把学生演唱的声乐作品正谱伴奏弹得滚瓜烂熟，她常常加班练琴的情景同样也感染着她的学生，因此深受学生的爱戴。

杨国亮是韩老师学生中最逗的，他模仿能力非常强。表演课上，杨国亮表演的人

物模仿再现了韩老师在上课前半小时热身练声的过程，用钢琴上的那块手帕擦汗的经典动作模仿得非常到位，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学生能够在课堂上表演自己的老师，一定是老师的形象已经深深印在他们心中。杨国亮说，没有老师在课堂上鼓励他要有走出去的勇气，他就不会有到基层去锻炼的想法，也不会有被引进到中南民族大学任教的机会。

（三）

青年时代，我喜欢在舞台上放飞梦想，认为观众的掌声就是歌唱的成功，因此，演唱的曲目一定是大众喜欢的、比较流行的，演唱形式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外在的表演风格不仅体现在舞台上，也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来，布置给学生的声乐作品也是跟着热度走，忽视了声乐教学基础阶段曲目选材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这种功利性的教学思

维，也许在较短时间可以看到表面的效果，但对于学生的长期发展无疑是拔苗助长的，它违背了声乐教学的客观规律。在声乐教学基本功阶段，要静下心来好好地掌握意大利古典艺术歌曲打底子的关键步骤。身在其中的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老头子”发现了我教学上急功近利的苗头。



周希正（左）与恩师韩勋国合影

有一次,在声乐教学业务研讨会上,“老头子”首先开炮了:“有些老师教学应该多动动脑筋,大一的学生怎么能够唱那么大的意大利民歌,追求歌曲的舞台效果,把声音唱得那样满,特别是上课练声两个8度的幅度,那是在害人。教学不要张牙舞爪,要静下心来思考。”大家都不作声,但心里一定明白。说实话,声乐教师其实是个性比较强的,同行之间各自为战,特别是对于教学更加是讳莫如深。很少有人像韩老师这样直白地亮出自己的观点的,而且是这般犀利的语言。“老头子”这样的“金句”虽然不中听,但如良药。

今天回想起来,“老头子”以这样的方式敲打我,其实是向我传递他教学经验的精髓。注重基础、循序渐进,这也成了我如今的教学理念。如果没有这样的前辈在教学为我把握教学的标准,以这样的方式敲醒我,也许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理解声乐教学的内涵。“老头子”就是这样一个透明的人,无论是在舞台还是讲台,始终怀着对声乐艺术一颗敬畏的心。在他的眼中,声乐艺术的衡量标准不会带有任何其他人的因素。他简单、直率、真诚的个人气质,常常感染与他合作的人,虽然他经常会在工作中用特有的韩式“金句”让我下不来台,但我仍然从内心敬仰他。因为他不“作”、不“装”。

从事表演艺术的人都有同感,在艺术创造中,感性是塑造人物的必备素质,它能够让表演充满灵气。因此,大部分表演艺术家感性认知能力一定会超越理性认知能力。而在学术研究和理论梳理中,感性的跳跃性不容易抓住理性的逻辑线。所以,科研对于从事声乐表演的声乐教师来说,是晋级的拦路虎。在我刚刚进入华中师范大学声乐团队之时,对于科研曾经迷茫过,看到韩老师已

经是声乐界的科研大佬了,我更加望而生畏,认为“老头子”一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直到有一天,我刚好同韩老师一起下课,一同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聊起教学科研,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如果总是把精力放在演唱上,你只能是技能型的教师;如果在艺术实践中留意艺术活动过程,你将会发现平时没有注意的东西。而我希望你在演唱、教学中不仅要发现这些东西,更要能够找出它们内在的文化联系,这就是科研。”我很佩服地看着韩老师,由衷地说:“太牛了。”“不是的,我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在电脑上慢慢地敲出来的。”他说道。

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竟然走到韩老师家,韩老师干脆请我共进午餐。饭后,我们继续科研的话题。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我看见了她的许多研究选题和研究框架。那一次蹭饭打开了我科研的思路,“老头子”的现身说法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从此以后,我的《歌唱演员舞台魅力解析》等文章的发表,就是源于这次难忘的蹭饭。是“老头子”无私的“授我以渔”,才有了后来我三个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良师就在身边,现在每当我从韩老师的琴房门口经过,仿佛又能看见“老头子”在电脑上一个一个字敲打键盘的背影。那每一次的敲打,如同在告诫我,踏踏实实做学问,认认真真搞教学。

(四)

声乐教师是高校教师中最有色彩的群体,他们因为专业的特点常常会在光彩绚丽的舞台上激情高歌,表演的激情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处事方式和个性特点。他们在高校人文底蕴的熏陶下以各自的艺术风采、教育风格穿行在舞台与讲台之间。大部分声乐教师

一辈子都脱不了率真、感性的艺术家气质，他们的存在让高校肃穆的学术氛围有了那么一点轻松，为单调的校园生活注入了多彩的颜色。“老头子”就是其中典型的那一个，他用艺术家的方式让平淡的日子过得富有诗意，成为校园里让人羡慕的那一道风景。

人们常说：“人最大的乐趣是爱好成为了工作，最幸福的事是和自己相爱的人牵手走到老。”从这点看，韩老师是幸福的。朱智媛老师是他的夫人，曾经也是舞台上著名的花腔女高音，为了韩老师的事业逐渐退到幕后。离开舞台的朱老师将对艺术的那份深情，转移到对韩老师事业的支持、生活的照顾上。韩老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朱老师功不可没。她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不仅成就了韩老师，而且让儿子韩晓彤走上了国际声乐舞台。我们经常在华师情人路的林荫道上，看到韩老师挽着朱老师的手并肩而行的身影，这对艺术上的伉俪、人生的知音，成了我们眼中的神仙伴侣。

歌唱家的深情不仅具有艺术性，而且更具生活性。他们不仅在生活中保留了艺术家的浪漫，而且在事业上保留着艺术家的纯粹。“老头子”的学术思维非常跳跃、扩散，创新点往往会出人意料，这是艺术家的思维天性。我喜欢听他讲研究思路，韩式“金句”让规范严谨的学术讨论不乏味，充满生活的诸多乐趣。当我的声乐教学、科研还停留在声乐本体研究层面上时，韩老师已经开始跨专业、跨学科地思考如何在研究中体现声乐艺术的人文精神。

他提出美声唱法技术是为人歌唱服务的，声乐训练是以歌者健康歌唱为目的的教学理念。他撰写的《声乐艺术基础》《戏曲演员嗓音训练规律初探》《怎样运用歌声传达感情》等文章荣获湖北省文化科技成

果二等奖，并收编于文化部编辑出版的《全国文化科技成果汇编》一书。他的研究方法强调，人是作为技术的主宰而不是载体的，声乐艺术在运用、学习、传承的每一个过程都要融入大的社会关系。他用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拓宽了美声教学、演唱的思路，开创了融合创新的研究模式。他身怀独特的研究利器，行走在声乐艺术研究圈这个“江湖”中。

此时的“老头子”不仅是一个资深的艺术家，同时华丽地转身成为文化学者。这种文化与艺术的融合，使他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韵味。正如一位社会学家评价他的《音乐素质教育丛书——歌唱教程》《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和《高中音乐课程标准》三本代表作时说：“高大上的艺术家，接地气的研究视觉，象牙塔的专家，基础教育的关爱者。”的确，“老头子”开创的美声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风格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风格，也影响了我，确立了美声教学研究立足于本土的研究方向，也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声乐研究的传统。他对声乐文化与艺术的执着与坚守，在平平常常的工作中影响着我们，一如他歌剧舞台角色的魅力。他处世的行为、即兴的“金句”，是我艺术人生中最值得书写的记忆。

（周希正：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一名会计师的思想成长之路

◇ 梅佑轩

我是梅佑轩，1970年出生于武汉市新洲区农村。青少年时期，耕地、种植、施肥、灌溉、收割等农活都干过，家中的黑白电视机和收音机是我与世界连接的主要窗口。秉持着对会计专业的憧憬和追求，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选择就读会计专业，毕业后又分配在武汉市毛纺织厂财务部做会计工作。从此，我与会计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经济警察”“专业人士”“服务社会”，这些都是会计师在大家脑中的标签。自选定会计师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以来，我就清晰地认识到：这是一份需要“十年磨一剑”的职业，“严谨与专业并行”这一准则，宛如海上的灯塔，一路指引着我会计师的职业生涯。我于1998年3月正式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1999年3月从武汉市毛纺织厂辞职后，到武汉康力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审计工作，2003年4月开始担任该所主任会计师。

我的会计师工作经历，开始于对会计专业懵懂的梦想，沉淀于20余年打磨的日日夜夜，而真正的开拓和突破则应当感谢伟大的时代给予我在政治上的觉悟，真正让我实现了“既要服务客户，更要献礼社会”的思想飞跃。

有幸参政议政，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从农村走进城市，从会计逐步转型为注册会计师，我的职业轨迹一直在稳步推进，但又尽显枯燥与平凡。2006年年底的一天，市委统战部到武汉市注册会计师行业考察调研，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充满朝气，又或者是党外人士的身份，有幸被市委统战部



2018年8月，梅佑轩委员（中）参加武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赴新疆国情考察活动，向博乐市青得里镇祖木墩村捐赠现金5万元

和市财政局推选作为武汉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培养对象，这成为开启我人生新轨迹的重要起点。

2007年，我成为第十一届武汉市政协委员。与此同时，我进一步提升了对于会计师行业的理解和认识，逐渐认识到以自身的力量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履行会计师群体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当年年初，我先后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新当选政协委员履职培训班和市委统战部组织的武汉市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培训班。在那里，通过培训班组织的理论学习、互动交流和现场考察，我开始深刻反思一名会计师在时代和社会中的角色。或许在大家眼里，会计师只是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信息风险分摊者”和“信息风险降低者”，但我心里却逐渐萌生出更有力量的思想种子，逐步认识到，我不仅是一名会计行业从业者，也是一名政协委员，还

是一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要以专业能力为基础延伸自己的职业深度，更要以政治觉悟为抓手打破自己的职业壁垒。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履职尽责，这也是新时代每一个会计师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份为社会助力的思想在心中日益深化，我坚定了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

在一起的决心，努力争做优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我持之以恒地发挥专业优势，为社会传递热情和正能量，热衷于公益事业。也正是因为这份关乎社会的担当之心，让我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职业形象，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先后当选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武汉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武汉·同心注册会计师服务团执行团长。

发挥专业优势，以会计师视野助力社会工作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力量，我不断探索着专业优势和社会工作的平衡点。“以天下为己任，以报国为夙愿”的声音一直回荡在心头，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以会计师的专业视野为社会提供帮助是一件富有价值和

意义的事情。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出发点，我连续担任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届市政协委员，在15年的时间里坚定不移地围绕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会计师职业身份建言献策。

撰写政协提案70多份。2011年，我提交了《关于建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服务外包示范基地的建议》提案，在与财政局相关领导一起考察天津会计服务示范基地之后，2012年12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湖北省财政厅、武汉市财政局和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等四方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创建了“武汉·中国光谷自主创新会计服务示范基地”。我持续关注光谷基地的发展，为基地建设提出指导意见或建议。经过近10年的建设，光谷基地培养了中审众环、大信、信永中和、致同等一批具有证券执业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着光谷大型国有企业和一批上市公司；也培育了康力、京华、经纬等一批做精做专的

中小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着批量的中小科技企业。光谷基地成功打造成为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对接的桥梁，促进了企业和会计师事务所双发展。光谷基地示范模式也因此得到财政部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高

度肯定，长期在全国19家会计服务示范基地排名前三甲，我撰写的此份政协提案也被评为市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优秀提案。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1月27日，我撰写了《关于我市实施受赠医疗物资和资金及时向社会公告的建议》，被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及时采纳。近年来，我撰写提交的关于会计服务业、城市营商环境建设、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30多篇高质量提案，因详实的数据分析、科学严谨的逻辑论证、精准务实的意见建议，得到提案办理单位的高度肯定。武汉两会期间，我接受过人民网、《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楚天都市报》等中央和省、市党政主流媒体专访和报道。

带领行业人士助力大武汉建设。2008年，为了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推进全民创业工作，在市委统战部的领导下，我积极整合律师、评估师和税务师等专业资源，



2018年12月4日，梅佑轩委员（前排右一）发起的湖北自贸区财智服务联盟成立

创建武汉知识分子联谊会创业服务联盟，为武汉市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公益性的辅导服务，降低了创业风险，服务了一批海归和大学生创业，创业服务联盟的模式得到中央统战部的肯定。2012年，在市委统战部和市财政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成立“武汉·同心注册会计师服务团”，服务团现有成员中有70多名注册会计师，我当选为执行团长。服务团常年开展进园区、进楼宇、进企业“三进”财税优惠政策讲座活动，每年开办近百场次专题讲座。2020年武汉复工复产复市后，服务团采取线上、线下方式，宣传党和政府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优惠政策，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给小微企业，让他们更有获得感，增强复工复产信心。为了支持湖北自贸区建设，2018年12月，在省财政厅的指导和支持下，由我发起，协同德勤华永、中审众环、信永中和、得伟君尚、ACCA和光谷金融控股等成立了湖北自贸区财智服务联盟，为自贸区企业提供会计、法律、人才培养、金融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人才、技术、商品、资本跨境流通便利化，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积极参与民主评议。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三大主要职能之一，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财政民主评议”已打造成为武汉市政协民主监督的一个品牌，10多年来，作为公共财政民主评议委员，我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从财政资金预算和绩效管理视角开展评议，致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从2017年开始，连续4年参加了武汉两会期间召开的市长与政协委员协商

座谈会，围绕自贸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农业农村财务治理等主题作会议发言。

立足业务笃思笃行，当好行业表率

2006年，康力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员工不到10人，年营业收入不到100万元，是武汉市属的小事务所。在担任康力所主任会计师的15年里，我同步担任着市政协委员的社会角色。“先看远方，再看脚下”，一直都是我在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思考时代的方向和发展重点，始终坚持跟党走、听党话，围绕市委、市政府战略部署，走创新发展之路是我在思考过后得出的结论。同时，基于会计师行业业务属性，我决定要以先行者的姿态勇敢地开启改革创新发展之路。

在这条力争先行、做好行业表率道路上，我一走就是20余年。值得庆幸的是，在尝试、否定与再尝试的循环中，康力所终于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生成了符合时代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业务模式。

发展财务外包，助力科技创新创业。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是科技创新创业集聚区。从2011年开始，我带领团队深耕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创了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式和全方位的财务外包服务新模式，降低了其创新创业成本和创新创业风险，提升了其核心竞争力。截至目前，康力所常年服务着269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33名湖北省百人计划专家、1000多名“3551”光谷人才计划入选者等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已培育了5家企业在A股挂牌、18家企业在新三板挂牌、184家企业在武汉股权托管中心挂牌，孵化毕业了3000多家科技创新型企业，管理着500多亿元的客户资产，服务着

4000 多件原创性发明专利。福布斯中国 2017 潜力企业榜中有 2 家企业是我们的客户。康力所开创的财务外包服务新模式，已成为我国中小会计师事务所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科学发展和诚信发展的典范。

2015 年 12 月，我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邀请，

参加了“扬州中小微企业融资会计服务示范基地揭牌仪式暨发展专业服务 推进创新创业论坛”，并作“财务外包助推创新创业”主题演讲。2020 年 12 月，康力所受邀参加“纪念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恢复重建暨行业改革发展 40 周年座谈会”，代表全国中小会计师事务所发言交流。

自主研发财智公共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改变着社会和商业环境，财务智能化新时代已经来临。2016 年，我再次带领研发团队，自主研发了财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在线记账、在线看账和在线查账等功能，开创了财务服务集中化、信息交流数字化、数据传输远程化、工作场地虚拟化、流程管理标准化的跨越时间与空间会计服务新模式。2016 年 6 月，财政部和省财政厅领导调研康力所会计管理工作。财政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赵鸣骥同志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会上，充分肯定康力所通过建



2021 年 1 月，梅佑轩委员（二排中）在武汉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市政府主要领导与政协委员协商座谈会上举手发言

立财务共享中心、数据大平台等，服务中小高新科技企业、推进业务服务转型升级的经验。康力所也因此荣获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授予的“一特三高”奖项。

近年来，康力所先后荣获湖北省文明会计师事务所、武汉市文明会计师事务所、武汉现代服务业领军企业等荣誉称号，其党支部被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授予“全国先进会计师事务所党组织”、湖北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市直机关工委授予“市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截至 2020 年，康力所现有员工 100 多人、年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万元，在武汉注册会计师行业排名前三甲。

真诚、热心与爱心，拓宽事业的广度

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到“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数年的参政议政，

我的政治觉悟在不断提高，自身在不断突破着自己的舒适区，对于“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这句名言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由于思想上的成长，我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将自己的真诚、热心与爱心投入到基层社会工作中。能用自己的专业力量为社会带来一些改变，成为我近年来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8年8月，我参加了市委统战部组织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国情考察——新疆行活动，为博乐市青得里镇祖木墩村捐赠现金5万元，助力脱贫攻坚；2018年至2020年，我又带领团队成员连续三年为恩施州来凤县老茶村三木林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专业扶贫，为三木林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交了《财务清理报告》，给老百姓交了一本“清白账”，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奠定了坚实的财务管理基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主动向武汉市红十字会请缨，带领20多名专业人士，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为市红十字会提供了价值63万元的专业捐赠服务，根据捐赠人意愿共将7000多万个快递包裹、17亿多元爱心捐款，精准分配到金银潭医院、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单位，社会捐赠资金及时分配率达99.7%，社会捐赠物资及时分配率达100%；6月3日，为了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我作了主题为“企业复工复产财务管控”的线上公益讲座，超过20万人次参与观看或点播。

这份事业，我一坚持就是15年。15年来，我始终坚持学习，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我感受到正是这份精神的指引，在不断发掘着我内心深处真善美的声音，怀抱真诚、奉献所能是我前行路上的不竭动力。这份力量，正是来源于政治自觉与事业的同步

成长，让我在自己钟情的人生道路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峰，看到了一处又一处过去无法企及的人生风景；让我在奉献中体会了责任与善意，在助力中理解了担当和拼搏。

而今，我们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也身处一个奋进的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行业改革闯隘探路，为民族复兴献计出力。正如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生命唯有和时代的崇高责任联系在一起才能更加永垂不朽。

“精于专业，勇于担当”，是我作为会计师投身社会工作的思想基石。前路漫漫，道阻且长。然行而不辍，则未来终将可期。

（梅佑轩：十一、十二、十三届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康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主任会计师）

亲历童家湖“阻击战”

◇ 魏云乔

2010年至2016年，我一直担任武汉市府河童家湖段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协助指挥部政委、指挥长工作。这期间，大汛小汛年年防，堤防通道岁岁修，几乎没什么大汛大险。可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16年夏季的那场防汛抢险战斗，至今仍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2016年6月30日晚至7月1日的连场大雨和7月4日的一场特大暴雨，致使府河童家湖段水位陡涨3.5米，达30.09米，超历史最高水位。8日晚，童家湖内湖拦渍堤水位达26.32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29米。

童家湖拦渍堤与府河大堤呈“T”型，拦渍堤是武汉天河机场重要的防汛屏障，机场跑道地势虽较高，但一旦有闪失，湖水入侵机场南动力区的地下管网，则直接严重威胁机场的正常运转。天河机场告急！

根据湖北省防指的命令，4日上午，保卫天河机场的童家湖“阻击战”打响了！

抢险，闻令而动

童家湖拦渍堤长3.3公里，宽4米左右，湖面约4.1万亩，属封闭性水域。2015年末至2016年年初，由于大型工程机械反复碾压，部分堤面破损严重，堤身裂缝累累。加上夏季连日水位陡涨，散浸、管涌、脱坡、下沉等险情迭出。

7月6日凌晨，堤上出现百米漫堤，局部脱坡、下沉，此时的水位超过25.9米的争取水位。这一水位，高出天河机场地下管网4米多！

天河街500余名干部群众分段用沙袋填筑子堤，驻汉空军某部260名官兵、170多名武警官兵和黄陂民兵预备役人员紧急驰援，奋战一天。

那时的堤上只有“抢”“上”“快点”“坚持”的吼声！

只有汗水、雨水、泥水交织的“嘀嗒”声！
只有疲惫里透着刚毅的肩膀扛起沙袋的“嘿哟”声！

只有颤抖滑动、前行的脚步声！

……

150根木桩扎进背水面堤脚，6万只沙袋加固堤脚、堤身，打桩固本、填筑子堤、土垒挺托、开沟导流、抽水反压、民垸分洪的保堤“组合拳”初见成效。天黑时分，拦渍堤上，一条白色沙袋长龙终于筑成。

与此同时，按省、市、区预案，祁家湾街等紧急转移童家湖垸内群众3000多人，农场垸、车站垸、朱店垸、四联垸、坡罗垸等9个垸中垸先后扒口蓄洪，垸内良田、渔塘、藕池、树木被淹。邻近的孝感市域的部分民垸也扒口分洪。这样增加了约4万亩水面，1.3亿立方米的库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拦渍堤的压力。

坚守，肩扛责任

7日下午，由于拦渍堤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又遭暴雨冲刷，本身单薄的堤身越来越糟糕。堤基不断下沉，多处漫溢，先后出现约300米、500米的脱坡。脱坡处，挡水全靠子堤，迎、背水面落差2米多，已超出堤身的承受极限。

7日晚，曾参加过1998年抗洪的武警水电第七支队抢险官兵280多人携带专业设备，赶赴驰援。他们将200多根6米长的钢管打进堤脚，搭成固定管架，并填压沙袋固基。官兵奋战至次日凌晨5时，监测显示，脱坡段仍以3厘米/时的速度下沉、8厘米/时的速度滑坡，随时有溃堤的危险。

8日上午，烈日当空，气温蹿至38℃。为稳住堤脚，指挥部紧急会商后决定，在堤

下强制抛填石料抵挡堤背。黄陂区防指紧急调动13个街乡的500台自卸车装上石料紧急赶往拦渍堤。11时许，首批自卸车赶到，将块石推向堤角边，一道新的堤坝不断向前延伸。府河大堤上，运送沙石等物资的车辆排成长队。

16时，拦渍堤水位蹿至26.32米，超历史最高水位。

险情仍在加剧。这时，黄陂区防指按预案把抢险人员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若有溃堤风险时，要给抢险人员撤岗留有足够的时间，并第一时间协调部队和人武部调冲锋舟做好救援准备等。

18时30分，堤内最后两位渔塘承包户撤离。

23时许，500米滑坡下沉处在洪水的推力下，堤身呈“）”型，几十名战士侧身用肩抵挡着“鼓肚子”的堤身。23时14分，艰辛支撑8个昼夜后，拦渍堤被撕开一个口子，湖水倾泻而下。

根据预案，抢险人员和垸内群众有序撤离，无一伤亡。

银燕，呼啸掠过

在军民合打童家湖拦渍堤“阻击战”的同时，天河机场方面启动了应急预案。

7日晚，湖北机场集团组织了300多名工人在南动力区外围加筑土堤。经过22小时奋战，于8日18时，在南五路沿线，一条高、宽各1米，长约2公里的土堤筑成，并全部用彩条布覆盖，再压以沙袋固定。

天河机场相关人士称，拦渍堤发生漫溃未对机场安全运行及地面造成影响，军警官兵及黄陂区干群奋力抢险，为机场应对外围汛情，有序组织防汛赢得了宝贵时间。

此时的府河大堤童家湖段上，每隔几分钟就有即将着陆或起飞的飞机从头顶呼啸掠过。1公里外的武汉天河机场人来人往，秩序井然。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不顾风疾雨骤，深入武汉防汛一线考察指导，指示必须确保人民群众和国际机场的安全，送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荆楚人民、驻鄂官兵的深情关怀与亲切慰问。

8日，中部战区司令员韩卫国深入险段，指导看望慰问抢险官兵。9日，省委书记李鸿忠冒着高温酷暑，深入机场和童家湖地区检查指导防汛工作，并指出：面对“98+”汛情，必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确保重要设施安全。此前，市委书记阮成发、副省长任振鹤、市长万勇等先后来到大堤，指导科学防汛，雨水、泥水和着汗水，湿透了衣裳，汇聚起巨大的抗洪力量。各级领导的指示，给全体抗洪军民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黄陂区防指3次连夜在童家湖防指召开紧急调度会、军地会商会。区委书记丁雨、区长吴祖云明确指出，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调动一切资源，奋力抢险。

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上甘岭特功八连所在营近300名官兵，白天奋战一天后，晚上夜卧大堤，天当被、地当床，裹着湿透的衣服，暂作休息，次日又投入战斗。武警水电第七支队200多名官兵、武警武汉支队及黄陂民兵预备役人员300多人、街村干部300多人共千余军民共同奋战洪水，保护家园。

30多名电力职工、7名供水职工，120急救车、移动通讯车，及时做好堤上水电通讯供给保障和医疗救护。30名交警沿路值勤，确保500辆运料车及近百辆防汛车辆有序进出。12名环卫工及时捡拾堤上垃圾。

童家湖堤防段水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日夜轮流值守堤段。

市政协主席胡曙光率驻会副主席冒雨慰问防汛大军。市妇联、孝文化促进会、黄陂区直有关部门及企业家等上堤慰问抢险官兵和干群，捐赠钱物、献上爱心。

如果说我国1998年的洪水是特大洪水，那么2016年的洪水就是“98+”。李鸿忠书记如是说。

如果把2016年抗洪比作战场，那么童家湖“阻击战”、天河机场“保卫战”，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报道如是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力亲为，谁都不会相信这是悲壮泣歌的“阻击大战”。省防指总结通报如是说。

此后，驻地280名官兵和祁家湾街、天河街400多名干部群众又投入了守卫府河大堤的紧张战斗。

大堤上，起降的飞机不停地呼啸掠过，天河机场繁忙依旧。

近年来，武汉市和黄陂区政府共投入约1亿元，整修加固了童家湖拦渍堤。该工程已于2018年5月竣工。与此同时，省、市水务部门共投入1.4亿元，新建了童家湖大型排灌泵站。该工程于2019年3月完工。这样一来，武汉天河机场区域主汛期可承受20年一遇的外洪内涝威胁。

（魏云乔：三、四届武汉市黄陂区政协副主席）

武汉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三级跳”

◇ 杨普社 熊恒多 张 凯

自1981年毕业至退休，我一直在农业战线摸爬滚打，从基层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推广、种子种苗销售到农业行政管理，亲身经历了武汉农业农村改革的全过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蔬菜产销体制改革，使武汉“菜篮子”供应华丽转身，让我感触颇深，难以忘怀。

勇立潮头瞪慧眼，劈波斩浪开新路

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美称，历来为商贾必争之地。早在明清时期，汉口的商埠就小有名气。明清以后商业迅速发展，商贾云集，百货汇聚。到了民国时期，武汉水陆两通，已成为南来北往的交通枢纽、物资交易集散中心。如汉阳显正街（瓜堤街）的瓜行、南岸嘴的渔行、西大街

的羊行、十里铺的牛行，汉口武汉关的猪行、河街（龙王庙）的海味品行、五福路的和记蛋厂，硚口的牌楼街屠宰场，武昌的鲶鱼套货场，青山的小华景街市场等各种行栈以及街头巷尾的露水集（早集），带来了武汉三镇“菜篮子”市场的一度繁荣。

解放后至1978年前近30年间，武汉的蔬菜产销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先后经历过“以销定产，计划经营”与“以需定产，产大于销”的改革探索，但这种“计划生产、计划上市、计划价格”的统购包销指令性计划，始终没有跳出计划经济的圈子，最终形成了生产与流通管理两张皮、生产者追求数量与消费者追求质量的两倾向、价格与供求两分离的现象。一到“春秋两淡”和元旦、春节，“菜篮子”供应就乱了手脚，市民怨声载道、呼声强烈。蔬菜的这种结构性短缺

不仅不能换来人民群众的笑脸，还带来了“多不得，少不得，不多不少也难得”的尴尬，一直困扰着政府。改革势在必行。

1984年年初，湖南省长沙市在全国率先实施蔬菜产销体制改革，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由于改革没有突破多家管理的经济模式和缺乏细节举措的周全性，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武汉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究竟向何处去？时任市长吴官正在听取市政府蔬菜产销办公室（下文简称市菜办）关于蔬菜产销体制改革方案的汇报后，要求改革方案在吸取长沙改革教训的基础上再做修改，酝酿出一揽子切实可行的改革举措。

1984年4月20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蔬菜产销工作的暂行规定》（武政〔1984〕35号）正式发布。该规定推出“大管小活”改革政策，提出对城市居民常需的18个蔬菜品种继续实行统购包销，其他品种一律放开经营。在政策实施四个月，“大管”管不住，“小活”活不了。为此，1984年8月10日，市菜办宣布了改革蔬菜流通体制的决定。决定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按照市场规律，生产与经营全面放开，彻底打破了统购包销的指令性计划格局。

在管理层面，成立市政府“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并将原市商委主管的市蔬菜公司整体划转到市菜办管辖，形成产销服务一条龙，避免了部门间的相互推诿。

在生产层面，扩充基地。市菜办协调市财政拿出1600万元，用于老四县（江夏、汉阳、黄陂、新洲）发展新蔬菜基地，主攻“春秋两淡”。新基地春抓“三大一小”（大白菜、大萝卜、大包菜、小白菜），秋抓“五瓜一菜”（冬瓜、南瓜、瓠瓜、苦瓜、菜稍瓜、竹叶菜），有力缓解了“春秋两淡”的压力。

在科技研发层面，整合资源。成立武汉市科技中心，将蔬菜科学研究所等五个涉农科研所整合归市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市农科院前身）所辖，以提高科技研发能力和科技攻关调度能力。武汉的莲藕、抗热萝卜、早熟大白菜、茄子等蔬菜的种子种苗，曾一度享誉国内外。

在科普与良种、良法层面，健全体系。成立市蔬菜种子分公司良种场（原洪山区蔬菜科学研究所整体划入），新成立市蔬菜技术服务总站，负责病虫害测报和技术推广；新成立《武汉蔬菜》杂志社（后更名为《长江蔬菜》杂志社），专注蔬菜实用技术，作为改革后基层站所人走楼空的科普力量补充；新成立市蔬菜生资公司，负责化肥、农药、钢架大棚的正规渠道采购与批发零售以及政策性农资的调拨。特别是市蔬菜种子分公司举办的武汉种子交易会至今不衰。从1984年起，一年一度的“种交会”引起全国乃至世界有关国家的高度关注，会议规模逐年扩大，会展品种呈几何级增长。1994年我任武汉市蔬菜种子分公司总经理时，来自国内的6000多家和欧美、东南亚、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50多家种企、高校和科研机构共3万人参加“种交会”，会展品种达6000多种，种子种苗交易额达4亿多元。不仅搞活了地方经济、丰富了蔬菜新品种，而且把“种交会”逐步培育成为武汉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仓储层面，完善冷链。市菜办争取国家资金1000余万元，在徐东征地60多亩投资建设万吨冷库，开辟长储、短储、另储业务，实施周转储存，为“春秋两淡”和“两会两节”的蔬菜调剂与供应提供了保障。

在市场层面，改变格局。市蔬菜副食品公司将所属的蔬菜收购站改为蔬菜批发交易站，零售国有菜场变一家包揽为多家经

营的集贸市场，改变了国有菜场一家独大的经营格局。

在流通层面，开辟“绿通”。市菜办会同市交通管理局，为专门从事“菜篮子”产品运输的农用车辆核发绿色通行证，以方便蔬菜进中心城区市场。

三面突破出真招，群策群力化风险

为了确保改革成功，在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菜办会同市商委、市工商局、市国土规划局等有关部门认真分析蔬菜产销各节点的风险，拿出了一系列举措。

走进田头听下情，规划指导绘蓝图。根据“菜篮子”产品消费需求，市政府提出建设百万亩蔬菜基地的构想。在规划布局方面，注意一盘棋。1997年，副市长董绍简、市农委主任杜远威来市菜办专题调研时，我提出的“稳定两环（二环、三环）、延伸两江（长江、汉江两岸）、开发两线（107和318沿线）”的百万亩蔬菜基地规划建议，受到与会领导的肯定。尔后，市菜办会同市国土规划局在制定全市蔬菜基地规划时，也吸纳了这一建议。在规划设计方面注意接地气。每逢灾害性天气，市菜办工作人员就跟着我到“水袋子”“旱包子”基地查看灾情、走访菜农，听取基层水务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得以较为全面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然后会同市水利局（现水务局）组织专家研讨，吸纳意见。特别是菜农提出大力发展大中棚保护地的建议被我们全部采纳到菜地建设规划中。最后确定以“百日无雨不旱，日降雨100毫米不淹”为规划原则，按照“渠相通、路相连、林成行、旱能灌、涝能排”的要求，做好“菜园子”给排水顶层设计和田园格式化规范，并印制成规划文本。同时，

还将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标准、钢架大中棚建设标准汇集编制成工具书。在1998年7月武汉遭受百年未遇的洪涝灾害中，凡按标准建设的基地都经受住了考验，较好地发挥了投资效益、工程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其他专项规划配套方面，“七五”至“九五”期间，还将蔬菜科技、蔬菜流通等其他专项规划和重点项目，纳入全市农业经济发展五年规划，为菜农增产增收和蔬菜产销稳价保供起到引领作用。

盯住源头修规制，编织监管防护网。蔬菜产前服务的源头当属农资供应与基地环境质量，而种子、农药是蔬菜丰产丰收和蔬菜质量安全的关键要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千家万户用种、用药、施肥，蔬菜农药残留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带来蔬菜质量安全的大麻烦。同时，蔬菜生产时有灾害影响，也对“菜篮子”市场稳价保供带来麻烦。1994年5月5日，武汉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菜篮子”工程的决定》，每年从蔬菜风险基金中支出800万元，用于抗灾救灾和国拨化肥的差额补贴，使生产环节有了应对之策的基本底数。1994年6月，市政府发出《关于切实做好西瓜摊点管理工作的通知》，为市场环节加了一道防护锁。而蔬菜基地环境质量如何从全域角度予以保障，却没有底数。1996年元月，我调任市菜办菜地建设处处长以后，正值《武汉市蔬菜基地管理办法（修正案）》前期调研综合阶段，我深感民心之重、责任之大。通过调研资料分析，摸清了管理的关键所在，提出将横抓条条（农业、公安、环保、质监等相关部门）、纵抓块块（区、街政府及其农业管理部门）纳入，得到了市菜办领导的认同和市政府分管领导的赞许。1996年11月22日，《武汉市蔬菜基地管理办法（修正案）》

正式出台。该办法提出蔬菜基地征用占用实施“征一补二”的原则,还就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和建立蔬菜风险基金作出若干规定,为保护基地红线、维持蔬菜基地保有量、维护产地环境以及抗灾救灾资金的支持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蔬菜质量高度关注,

“放心菜”话题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因叶菜农药残留引起的中毒事件仍难以杜绝。

1998年,我调任市菜办生产技术处处长后,就着手部门《规章》制定调研。1999年6月23日,《武汉市无公害蔬菜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产地逢出必检和农药监管行政执法的双重介入,使当年蔬菜中毒事件发生率下降80%。此外,我还以副主编身份,参与毛世荣、刘厚照主编的《新编蔬菜实用技术手册》的组稿工作。1997年12月,这本工具书正式出版,详细介绍了蔬菜新品种、新肥料、新农药、新设施、新技术,为新开发的蔬菜基地菜农抢占市场先机提供了新品种指引和前沿栽培技术。

治理“摊头”“农改超”,争创市场美环境。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格局的形成,武汉“菜篮子”基本告别了市场短缺时代。但农贸市场、马路市场、露水集脏乱差的现象严重影响营商环境和城市形象,“菜摊子”治理刻不容缓。90年代初,国家就提出绿色市场、绿色消费的理念。为抢抓先机,创造绿色经营、绿色消费美环境,1994年,市政府投入3000万元用于多功能菜场(含粮店)网点的改扩建,为绿色菜市场创建和环境治理打下基础。1995年,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发展的决定》,市财政每年拿出500万元支持农副产品绿色市场建设,鼓励工商资本、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多元投入,

共创共建。5年时间共建成骨干市场111家,形成主体多元的产权格局。1995~1996年,全市对皇经堂、武泰闸批发市场等9个副食品购物中心及53家规模以上国营菜场率先进行规模化改造,新建、扩建绿色市场65个,并将一批马路集市的商贩引进市场,实现了马路市场的逐步退出。市场内国有企业与个体的同台竞争,促进了营商环境的净化和道路畅通。

武汉西大门菜场(原工农菜场)是国有企业中第一个“敢吃螃蟹的”,1985年组建由国有控股、民营参股的西大门食品有限公司以后,瞄准国外超级市场的模式,转换经营机制,率先打破以菜为主的经营格局,调整供应链结构,拓展经营功能,增加水产品、禽蛋、肉制品加工、餐桌盘菜、卤制品、调料等经营项目和农产品检验检测功能,先后筹集资金共200多万元开展超级市场改扩建。市场开业后,很快形成了横向多品种、纵向精细化、服务系列化的一条龙供应链,赢得了消费者信赖,短期内销售额增加一倍以上,当年实现纯利润6万余元。随后,武昌广埠屯蔬菜食品市场、水果湖蔬菜食品市场参照西大门农副产品超级市场的模式,拿出配套投资,实施市场改扩建。1998年,江岸惠济路蔬菜食品市场与深圳华储公司合作,按照“农改超”模式实施市场改扩建,联合建成武汉百惠蔬菜食品商场,成为我市“农改超”的样板。

1998年6月,武汉中百集团旗下的中百仓储有限公司在唐家墩开辟涵盖蔬菜、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在内的连锁超市。1999年又分别在江岸二七路和武昌水果湖、珞狮路开办类似的连锁超市。在我们的指导下,中百涉菜连锁超市均设立蔬菜农药残留自检室,每天公布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结果,开

净菜进大型超市之先河。随后武商集团旗下的武商量贩公司、中商集团旗下的中商平价公司等大型超市也相继将净菜等鲜活农产品引入超市，一批外资企业入驻武汉后也将净菜等鲜活农产品纳入经营项目，形成了共推格局。净菜进超市催生出一批净菜配送企业的兴起，如武汉兰氏蔬菜有限公司、武汉元生蔬菜配送有限公司、武汉香飞农园蔬菜配送公司、心连心蔬菜副食品配送公司等50家配送企业。配送公司直接从产地采购蔬菜，经粗加工后直接进超市，减少了中间环节。

1999年以后，市工商部门将中小型农贸市场纳入标准化菜市场创建，参照超市风格，拓展功能，所有摊位的蔬菜逢进必检，有力地规范了市场秩序。

重构机制抓调度，多方协作结硕果

按照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的要求，压实“菜篮子”产销监管层级责任制，构建发现问题发现机制、风险评价机制、预警响应机制。市政府“菜篮子”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蔬菜产销工作调度会，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在多部门的协作下，我市“菜园子”“菜摊子”的产销保障力大大增强。截至1999年，武汉市蔬菜常年园发展到60万亩，一季园（不含间作套种）40万亩，蔬菜播种总面积220万亩，春提早、秋延后的蔬菜棚栽设施保护地35万亩（其中钢架大中棚11万亩，竹架中棚24万亩），年产蔬菜580万吨，蔬菜自给率达到70%以上（夏秋季自给有余）；大中小型涉农超市300余家（不含集贸市场），蔬菜中心批发市场5个。大改革、大流通带来了大变化。我市蔬菜质量和数量得到明显提升，“老、粗、黄”的蔬菜逐步

淡出市场，“早、鲜、嫩”的蔬菜品种不断增多、花样翻新，极大丰富了武汉“菜篮子”的供应，迎来了新一轮市场繁荣。

武汉蔬菜产销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受到国家农业部和国内各大城市的高度关注。1985年，长沙、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成都、贵阳、郑州、沈阳等40多个城市先后来武汉考察学习。1998年6月3日，全国“菜篮子”产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在武汉召开，武汉的经验在会上得到交流，时任农业部副部长齐景发在会上宣布：“我国‘菜篮子’的短缺时代宣告结束。”武汉“农改超”工作的超前探索，不仅保证了市民消费安全、规范了市场秩序、美化了市场环境，还为2001年国家12个部门联合实施“三绿工程”（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和2005年国家经贸委全面推进“农改超”工作提供了经验。

（杨普社：原武汉市农业委员会党组成员、总农艺师；熊恒多：武汉农学会秘书长；张凯：武汉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

怀念谭维四先生

◇ 冯光生

时间过得好快，谭维四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记得去年第一时间得知先生逝世时，我正在外地，匆匆处理完当天约定的工作，于次日赶到武汉谭家。在那期间，虽然一直竭力控制自己，却总是不在工作状态。直到在灵堂，面对谭先生慈祥的遗照，情绪才完全释放。先生于我，亦师亦友亦亲人，亲切如父，恩重如山。我的学业和人生道路的重要环节都有先生的指引、扶持、鞭策和鼓励。失去一位亲近、和蔼的前辈，内心不只是悲痛，更有不舍。

认识谭先生源于“曾侯乙”。1978年夏，我由光化县（今老河口市）文化馆抽派到随县，参加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的发掘工作。偌大的工地上有考古人员、文化干部、驻地军人、当地民工，而穿梭于几百号人马中指挥调配的就是大家所称的“谭

队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忙碌。与此相配的是他高昂的声调、响亮的嗓音、湘味浓郁的普通话、身首前倾的行走姿态和风风火火的步履。40多年来，这忙碌的身影被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不断叠加。谭先生就是个生命不息、忙碌不止的人。即便是晚年卧床疗病，在清醒的间歇，他的大脑也还在忙碌，满脑子里装的是工作、事业和他记挂的人。

发掘曾侯乙墓时，工地上吸引了如潮的人群，围观人流从四面八方涌来，每日络绎不绝。警戒线和保卫人员拉起的人墙时常受到冲击，极易产生人身和文物安全事故，严重影响发掘工作的进展。有一次，局面几近失控，临时参与政宣保卫工作的我已经声嘶力竭，感到万般无奈。突然，有人高声大喊：“大家安静，我是省考古队队长谭维四，



1986年夏，谭维四先生（左）、黄翔鹏先生（中）与冯光生在科教片《曾侯乙编钟》拍摄现场

我是工地总指挥，请大家听我说几句。”喧闹的人声竟奇迹般地安静下来。我看着站在高处的谭队长，他的个头不高，身体偏瘦，但气场十分强大。他挥舞着双手，从文物发掘意义到文物保护意识给大家简单明了地讲了一通，诚恳地希望得到配合。现场恢复了正常。我完全被他这登高一喊惊呆了、震住了。类似的场景，我在后来不同的境况下也经历过多次。“我是谭队长”“我是谭馆长”“我是谭维四”，是谭先生气质的表征之一。这种谭氏“表白”曾遭到过误解和批评，谭先生也曾为此自我批评存在“个人英雄主义”。其实，能直面问题、临危不乱、挺身而出、亮明身份，恰恰是一个领导者敢作为、敢担当的优良品质。

谭先生关注我，是在考古队驻地听到我的手风琴声之后。他得知我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音乐系，便在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专家组考察曾侯乙墓时，派我接待专家组，配合专家组工作。这次机会，使我认识了黄翔鹏先

生一行，并与黄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因“曾侯乙”遇见谭维四先生，遇见黄翔鹏先生，并在这两位恩师的引导下，初涉音乐考古工作。那次穿越性的遇见，是我此生大幸。

谭先生对待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总是热情扶持，悉心帮助，放手使用。在发掘工地，对于我们一批来自文化馆的年轻人，他一方面请考古专业人员对我们进行培训，让我们旁听来自全国各地专家的研讨会、座谈会；一方面根据实际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带动大家在实践中学习，在工作中运用。而我，正是在谭先生的推动下，一步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在与音乐专家组的共同工作中，开始接触编钟、编磬等古乐器知识，学习出土乐器的信息采集方法；在首场曾侯乙编钟音乐会的筹办中，学会了编钟演奏，组建了一支被黄翔鹏先生命名为“考古乐团”的编钟乐队；在参加纪录片《曾侯乙墓》的摄制中，第一次使用编钟为电影配乐；在参加中国历史博物馆《曾侯乙墓出土文物陈列》的展览中，学会了讲解，并负责编钟的现场展演。每次完成任务之后，谭先生都会给予我充分的肯定和鼓励，而每次肯定和鼓励的同时，总会有新的任务下达。到1980年，谭先生已让我参加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负责曾侯乙编磬的复原研究工作，并与黄先生一起策划《音乐研究》1981年第1期“曾侯乙墓音乐文物专辑”。这些一步步加重的任务，都令我感到吃力。谭先生或亲自策划、亲自指挥，或请黄翔鹏、王湘先生给予指导。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我

无形中已涉猎到博物馆音乐文物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完成了一个由白丁到初学者的进步过程。

在整理曾侯乙编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编钟中层横梁上有被遮盖着的与上层横梁类似的设置，推测与上层的两组钮钟相关。向谭先生汇报后，他立即组织绘图、摄影，热情鼓励我就此深入研究、撰写文章。见我有畏难情绪，信心不足，他表示要亲自挂名助阵。他一边与我讨论提纲，一边拟稿示范。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我们合作完成了《关于曾侯乙墓编钟钮钟音乐性能的浅见》一文。这篇涉足音乐考古的处女作，得力于谭先生手把手的指引。它的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从参与曾侯乙编钟演奏起，谭先生就打算把我调到省博物馆，让我培训讲解员演奏编钟。1979年5月，他先通过北京新影苗炬主任在闲聊中了解我的想法，确认我的兴趣和愿望。随后，以赴京参展为由将我借调到省馆，同时运作正式调动程序。因为是从县文化馆调入省博物馆，我和另外一位考古专业年轻同事的人事调动困难重重，久办未成。谭先生当时因病住院，他从博物馆事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十分焦急，便不顾休息，抱病拟写申请报告。此事正巧被前去看望他的省文化局韩光表局长所了解。韩局长说，别写了，这事儿我来办。终于，省局调令下达了。之后，谭先生还专门为我的调动给襄阳地区文化局领导打电话，

并特别委派专人一层层跟进落实。于是，1981年春，我正式调入湖北省博物馆。随后，谭先生专门托付黄翔鹏先生辅导我学习中国音乐史并撰写曾侯乙墓发掘报告“乐器”部分。自此，我确定了求学方向，走上了从事音乐考古的专业道路。谭先生对我的培养，可谓循循善诱、煞费苦心，充满着老一代博物馆人和考古工作者对后学的希望。

自曾侯乙编钟出土后，围绕着如何保护、研究、利用这一国之瑰宝，谭先生进行了一系列开拓性的探索。诞生于发掘工地的“考古乐团”是他亲自指导；在编钟出土地举行的首场曾侯乙编钟音乐会是他总体策划；在博物馆陈列进行现场动态展示性表演，也是他首创；联合音乐、声学、铸造多学科协作攻关，开展复制性研究及研究性复制，也是他指挥。他在全国考古界率先向音乐学者开放考古现场，为激活编钟古乐器最为宝贵的音乐价值奠定了基础，并由此成为中国考古与音乐学结合的开拓者。谭先生对于曾侯乙编钟的重视和对音乐考古的支持，也曾遭到过误解，被批评为片面抓编钟，要把湖北省博物馆搞成编钟馆。其实，谭先生这位锐意进取的博物馆管理者心中想的正



2018年9月，冯光生（右）到医院探望谭维四先生

是博物馆建设的大格局。他深谙特色及个性建设是博物馆发展的活力所在，并不遗余力，执意为之。在他的关怀和推动下，湖北省博物馆成为国内业界最早建立音乐文物陈列研究室的博物馆，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博物馆协会乐器专业委员会编钟研究院的研究基地。国际同行已将湖北省博物馆视为世界音乐考古的研究重地。

在编钟研究以及中国音乐考古学建设中，他既是一个积极的促进者、践行者，也是一个潜心的学习者、受益者。他戏称自己具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工队员的音乐水平，有这点儿底子，不至于提到音乐就发懵。涉及编钟音乐学研究方面的文章，他都会认真学、反复读，不懂之处，也会常常请教。渐渐地，音乐文物理念在他的印记中得到强化。1986年冬，谭先生到江陵雨台山巡查考古工地工作。他发现一些盛放着竹木残件和破碎漆皮的容器，据考古人员说没有什么成形和有保留价值的物品，便询问是否一片片检查过，对方回答说没有。谭先生急了，立刻发火说：“这样做是不行的！”他不允许因为疏忽遗漏掉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或信息。依他的经验，严重腐烂的竹简、竹木乐器或其零件极易成为难以辨认的状态，但它们即使烂成碎片，也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果然，在他责令仔细清洗复检后，4支竹律管残件被发现，且每件律管上都有墨书文字，内容是可以与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通论的乐律理论。经研究，这4支律管是战国中期的楚国律管，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律管实物，也是先秦时期仅存的竹质律管。它们对于研究楚国乐律及战国时期的音乐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乐律史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谭先生马上表扬了知错即改的年轻的考古

领队，督促其写出简报，并帮助联络发表。这件事也是谭先生重视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收获和贡献。

谭先生是个能成事的人。他的成事，固然有幸运的因素，更主要的是他有开放的胸怀、创新的精神、包容的心态和大格局。为了成事，他吃得苦、霸得蛮、不服输、不气馁，撞到南墙也不回头。为了成事，他能妥协、能包容，能低调、能迂回，抓住时机再起步。因为他所要成的都是自己终生热爱的事业。他也经历过事业的起起伏伏，感受过世态炎凉，但为了事业，他可以人不在位，却时时在岗，不在乎被称为“不是馆长的馆长”。他也遇到过同事怒目相对，合作伙伴摔门而去，但为了事业，他可以用沟通化解矛盾，双方重归于好。他的大胸怀、大气量赢得了同事和合作伙伴的尊敬。

从随县擂鼓墩的幸运遇见开始，无论是工作和生活，我一直受到谭先生的关爱。我从一个24岁的年轻后生成长为一个音乐考古学者，每一步都有谭先生的支持、关注和激励。我事业不顺的时候，他同样焦虑、纠心；我每取得一点点成绩，他都由衷地欣慰，甚至于兴奋。2018年9月，我到医院探望他时，老人家很快从一种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起来，如同当年的神情，带着手势，告诫我说：“一定要把编钟研究坚持下去，要研究深、研究透。”不曾想，这竟成了先生对我的最后嘱托。

先生的嘱托，永远在我心中。

（冯光生：编钟研究院院长，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中心副理事长、研究馆员，湖北省博物馆原副馆长）

十年沧桑话巨变 珞珈山下水生烟

◇ 欧阳海龙

在人生的刻度上，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也只是沧海一粟。但过去十年，必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大书特书。这十年，是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十年；对江城武汉来说，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历经疫情冲击而浴火重生的十年；对我个人来说，则是因亲身经历其中而深感幸运的十年。

十年间，我从豫西南一座小城来到江城武汉，求学、成家、立业；从一名埋头象牙塔的学子，转变为青年社科工作者。十年中的前六年，我在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下文简称水生所）度过一段异常宝贵的求学时光。随后四年，我定居于武昌、工作于汉口，一直关心着水生所的发展。十年间，我从一个年轻人的视角，见证了水生所的沧桑巨变。

六载求学路难，至今犹挂牵

2011年夏，我考取水生所研究生，师从胡春香研究员。初入水生所，百米香樟大道绿荫始浓，阳光透过叶隙洒落满地。这一幕，成为我对水生所的最初记忆而深刻脑海。林荫道的尽头，则是在此前一年方才落成入住的水生所研究生及博士后公寓。背着行囊，望着掩映在绿木之间错落有致的几栋建筑，我在所门口伫立良久。随后几年，这里成为我的筑梦之境、逐梦之所、圆梦之地。

第三个夏天来临时，我的硕转博申请考核通过，开始提前攻读博士学位。研一和博一时，经常穿过武汉大学和武大西门对面的一片棚户区，到小洪山脚下的中科院武汉分院去上集中安排的基础课。那片与武大多

年为邻的老房子，如今变成了湖北省科技创业大厦和一个还建小区。

硕博连读的六年间，我所在的实验室从事的是水生所最独特的研究方向之一——荒漠藻类。却不料，因此将足迹辗转遍及祖国西北的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和华北的内蒙古等地。四季冷暖、八方纵横，科考调研的奔波路上，有幸得见祖国的辽阔地域、多样地貌、壮美山川，构成今生再难复制的特殊经历和难忘记忆。而诸如通宵达旦开展实验、殚精竭虑分析数据、苦思冥想撰写论文、废寝忘食准备答辩等求学细节，经过读研读博锤炼的人可能多少都会有相似的体验。师恩如山、苦心似海，终扶我走完此程，如期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并取得学位。随后，我顺利通过武汉市直事业单位招聘，进入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此时，我在水生所的第七个夏天如约而至，突然觉得阳光是如此的夺目而灿烂，却也再次想起了初入水生所，林荫道上斑驳的阳光。

更奇妙的是，我在水生所邂逅了我当时的同窗、现在的妻子。妻子 2014 年硕士

毕业后留所工作。因此缘故，我们在水生所一直居住了长达七年半的时间。其间的 2018 年夏季，我们的女儿出生，并在这里度过了她半岁之前的襁褓时光。2019 年元月搬离水生所后，我仍时常回所走动。但凡重要活动，我也必以校友身份前往参加。

沪上迁址武汉，沿革中发展

水生所地处武汉大学西北一隅，背靠苍翠珞珈山，面朝浩渺大东湖。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与武大工学部一直有一扇仅一米多宽的铁栅栏门相通。奔走于校本部和医学部之间的武大学生、漫步于武大和东湖风景区的诸多游客，都时常由此门穿行。从武大经由小门过来，便是那条隔开水生所实验办公区和生活区的林荫道。因为这样特殊的位置，非常多的人都误以为水生所隶属于武大，却不知，隶属于中科院的水生所有着自己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

水生所素有研究生入学第一课接受所情所史教育的传统，也因此，我熟知了她的



2014 年水生所园区俯瞰

前世今生。水生所的前身，是1930年在南京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4年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又分建成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抗战期间，为避战火硝烟曾一度辗转远迁湖南衡阳、广西阳朔和重庆北碚等地。中科院成立后，于1950年2月将前国立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植物研究所藻类部门和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合并，组建为中科院水生所，所址在上海。同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开会通过科研单位负责人任命，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了任命王家楫先生为水生所所长的通知书。

如今70年过去，这张见证和承载了一段历史的任命书纸张已经发黄，但上面鲜红的国旗图案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印记依然鲜红。经精心装裱，它先收藏于水生所水生生物博物馆，后收藏在水生所所史馆，成为极为珍贵的史料。每每见之，总是心怀激荡。

1950年后，水生所主要围绕淡水生态系统开展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但偶然看到文献记载，1935年，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伍献文先生（1955年被选聘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曾主持了我国首次海洋科学综合考察，也是一段鲜人为知的故事。1954年，水生所整体迁至武汉现在所处的位置，也进入了新的发展轨道。

山清水秀依旧，园区换新颜

水生所门前，是沿着珞珈山脚和东湖岸线蜿蜒曲折的东湖南路。它一面临湖、一面靠山，法桐茂密成荫、浪涛轻拍湖岸，如织游客穿行其中，享受着脚踏碧波、头顶树冠的绝美体验，堪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结

合最完美的道路。沿途如珍珠般串连着洪山礼堂、放鹰台遗址、武大工学部、凌波门，有因修路而一半被切到东湖里的“半边山”，有风光独特的风光村（2019年开始城中村改造）。当然，还有水生所。

水生所准备迁址武汉前，武大将校园西北一块湖滨地划给水生所建设使用。为了与武大整体建筑风格保持一致，水生所最早的三层实验大楼（现综合楼）增加了宫殿式的屋顶。这算是水生所与武大的另一段渊源。鲜有人知的是，东湖南路最早是武大校内直接与东湖相接的一条土堤。20世纪50年代末才开始扩建土堤成路，因此还铲平了水生所1-7号宿舍楼（建成于1953年）所包围的一个小山包。这片小楼，于2021年进行了翻新重建。

过去的十年，水生所园区面貌变化极大。在我初进所时，研究生新公寓和2号实验楼才落成。之后公寓一楼建成了新的食堂，研究生们再也不用结伴到武大食堂用餐。一栋一半建于1959年、另一半于1992年拆掉建新楼的“双拼楼”和一排建于1964年的养鱼房被拆除，建了3号实验楼。从老专家口中得知，这“双拼楼”和养鱼房曾承载了水生所几代人的记忆。老标本楼、图书馆也被拆除，建成体育馆。图书馆搬进了1号实验楼，建于2002年的水生生物博物馆也进行了改造升级。3号实验楼落成后，于2020年90周年所庆时建成开放了所史馆。园区道路、绿化、照明等基础设施全部改造更新。整个水生所，与十年前我初识的模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妻子在水生所居住的七年半里，先后住过研究生公寓、分别建于20世纪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宿舍楼。几度搬家，搬不断的是对水生所的深深眷恋。直到现在偶尔



2020年10月，欧阳海龙和妻子参加水生所90周年所庆活动

与妻子漫步园区，仍会不时走到曾经住过的那几栋楼下，追忆往昔岁月。

响应国家需求，科研作贡献

水生所的变化，更体现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背景下，学科的动态发展变化和学术成果的不断产出与转化上。曾经，水生所为了解决全国人民吃鱼难题，从上海远迁武汉。后来，逐渐形成水、鱼、藻三大优势研究领域（水环境保护、淡水渔业和微藻生物技术），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我所经历的这十年，就有数不尽的鲜活事例。

2016年，曾住我隔壁宿舍的博士生同学陆苏祥，参加了中国大洋第37航次深渊科考，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协助下采集西太平洋的雅浦海沟和马里亚纳海沟的深海鱼类标本，惹得我们一帮同学艳羡不已。

继20世纪70年代参加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之后，2019年，水生所再次组织科研队伍参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而陈宜瑜

和曹文宣两位院士，都曾在第一次科考中作出杰出贡献。

2019年，徐旭东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国际著名期刊《分子生物学与进化》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南极小球藻的论文，其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第一作者王雅丽从开始读研、到博士毕业、再到发表这篇文章，历经14年。其间不断

应用新的技术方法尝试突破，还险些超出水生所科研人员晋升副高级职称“非升即离”的8年限期，生动诠释了“面壁十年图破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极致钻研精神。

也是在2019年，水生所成立了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包括6个子平台。其中，国家斑马鱼资源中心成立于2012年，是全球三大斑马鱼资源库之一；淡水藻种库正式成立于1973年，我在西北地区采集的不少藻类样品也被收藏其中；珍稀水生动物资源库则拥有全球唯一的人工环境中长江江豚繁育保护群体，是国内外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淡水豚类研究平台……在新时代，这些平台正是践行“长江大保护”理念、促进长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2021年，有“水中大熊猫”之美誉的长江江豚终于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这与水生所数十年如一日的保护和奔走呼吁密不可分。作为国内从事鲸类保护生物学研究时间最长的机构，水生所还为鲸豚动物保护输送了许多人才，包括我研

究生期间的第一个室友钱正义——2017年他博士毕业后进入长江保护基金会，继续专职从事长江江豚的保护工作。

前辈桃李不言，精神永感染

水生所还有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就是老院士、老先生、老前辈们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限于文章篇幅，仅记录印象极为深刻的几件事。

2012年5月，我恩师的博士生导师刘永定研究员，荣获象征法国文化教育领域最高级别荣誉的法兰西金棕榈统帅勋章，并在水生所举行授勋仪式，他的众多学生从国内外赶来参加这一盛会。刘老师为治理湖泊蓝藻水华、开展藻类搭载返地式卫星和飞船生命科学实验、荒漠藻固沙试验等研究殚精竭虑，今已年近八旬的他仍常常奔走在学术研究一线，成为我们心中的高山仰止。

2017年11月6日，惊闻鱼类和生态学家刘建康院士逝世，享年100岁。数天后，刘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武昌殡仪馆举行，彼时我参加工作不过两个多月，与水生所许多校友一样自发前往送别。告别大厅内“奠基生态精研鱼类一代宗师名四海，致力创新服务国家百年功业惠九州”的挽联，高度概括了刘先生大气磅礴、浓墨重彩的一生。当时，我眼眶湿润了，脑海里浮现起以前90多岁高龄的刘先生坚持每天去办公室的场景。

2021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此时距离水生所鱼类学专家曹文宣院士正式提出应实行十年禁渔并不断建言，已经过去了15年。2020年12月，40余岁的“鄂江夏渔00042”退捕渔船被水生所水生生物博物馆收藏，这也是开展长江十年禁渔以来武汉市

第一条进入博物馆变为文物的渔船，见证了长江大保护的新篇章。不久前我带女儿到水生所参观时，特地在这条船前拍照留念，给她讲述曹先生和这条渔船的动人故事。

在水生所风雨90年的历程中，老科学家们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永远怀着一颗为国为民、科学报国的赤子之心，在国家有需求的时刻挺身而出、在地方有需要的时候迎难而上，发扬忠诚与热爱、奉献与付出、坚毅与无畏、团结与协作的爱国精神、科学精神和忘我精神，成为后来者的旗帜和标杆；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水生所人扎根江城大地，以建党100周年为契机，薪火赓续、开拓进取，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不懈奋斗努力！

（欧阳海龙：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辛亥名人胡兰亭和他湖北联中的孙儿胡佑华

◇ 王 立

胡兰亭，名齐勋，湖北武昌人也，信基督教。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光绪二十八年任武昌圣公会会长。会中设有日知会，专以开通民智为职志，前会长黄吉亭所创办也。兰亭接任，益加振奋。所购新书日报甚多。星期公开宣讲，批评政俗，无所忌讳。一时知识分子、忧国志士咸向往之。会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挠败，党人曹亚伯、刘静庵等即转集于此。兰亭聘静庵为日知会司理，静庵借为掩护之地。星期讲演，大倡其革命意义，后并以此为机关。会中人为兰亭危者，兰亭一笑置之。而革命思潮遂遍播于江汉军学界。……民国二十五年卒于武昌，享年七十有二。子三，长庆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归国历任文华、武汉等大学教授。……。孙二，佑文、佑华，现志愿加入知识青年军。……

此系辛亥革命先驱张难先 1944 年 12 月写于重庆歌乐山的《胡兰亭传》。张难先

作此传时，胡兰亭之“孙二，佑文、佑华”兄弟二人正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知识青年从军号召，投笔从戎。

胡佑华从小立志学医，国难当头之际，正在湖北联中读高二的胡佑华与读高三的长兄胡佑文同台签名从军。大哥胡佑文说：“华弟，你不该签名的，你一直立志学医，而我还没决定今后干什么。”胡佑华争执道：“大哥，要当兵，该我去，你是家中老大，我们家还得靠你这个大哥撑着。我尽管早就打算学医，但早学晚学都可以呀，等赶走了日本鬼子，我照样可以学医嘛！”最终兄弟俩谁也没有说服谁。

因事先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于是趁着周末，兄弟俩一同回家向父母禀报。开明的父母早已听说两个儿子在校签名从军，当即称赞道：“你们做得对！国难当头，保国才能保家，父母完全赞成你们的行动，从心里为你们兄弟俩感到自豪和高兴！”父母郑

重地交给胡佑文、胡佑华每人一枚图章以为他俩壮行，图章侧面刻着“精忠报国”“父母赠”两行小字。两枚小小的图章，寄托着父母的厚望，激励兄弟俩学习岳飞，抵御外侮，精忠报国。

（一）

胡佑华幼年和祖父生活在一起，他的祖父胡兰亭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少时孤苦伶仃，被基督教会武昌福音室收留后，英籍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牧师推荐他进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化书院习读。1882年，胡兰亭由教会保送至上海圣约翰大学，起初学医，后改修神学。1886年毕业后开始传教，曾任文华书院监学、武汉圣公会会长、鄂湘教区会吏总。

1902年，胡兰亭接掌圣公会下属的日知会。作为日知会会长，胡兰亭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庇护，并在张之洞所创立的湖北新军中宣传革命思想和发展革命队伍。日知会遂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反清革命团体，为日后武昌辛亥首义成功聚集和培育了大批职业革命者。

“丙午之狱”后，胡兰亭从日本回国，多方设法营救刘静庵等革命党人。他将回国时带回的照相器材带入狱中，将狱吏虐待、拷打、折磨革命党人的情景摄成照片，以揭露清廷的暴行。1911年7月，刘静庵因受重刑病死于狱中。胡兰亭为之理丧，且负责赡养其母，还将刘静庵之言行整理成《刘静庵》一书，公诸于世。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时，胡兰亭及圣公会属下各礼拜堂的圣职人员和信徒们在吴德施主教的率领下，参加了红十字会的救援行动，甘冒枪林弹雨对起义战士进行救

治。当阳夏保卫战在汉口鏖战之际，作为汉口救灾委员会主席的吴德施主教，将临近战火第一线的圣保罗堂——圣公会鄂湘教区总部临时改成一座伤兵医院，为革命将士服务。吴主教的夫人顾美玉女士还充当了该临时战地医院里最出色的医护人员。胡兰亭亦积极发动和组织教友救护伤员，掩埋遇难者遗骸。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为表彰胡兰亭爱国传教、伸张正义的功绩，特地赠其题有“博爱”二字的横匾。民国政府成立后，胡兰亭一直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终生布道，老而不衰。

胡佑华4岁起就和祖父胡兰亭一起生活，直至1936年4月祖父逝世。在同祖父朝夕相处的6年中，年幼的胡佑华时常见到一些日知会的老朋友殷子衡、张难先、余日章等辛亥名人来家里看望祖父，也见到一些汉川乡下的远房亲戚远道而来。祖父胡兰亭以博爱之心待人，不时接济那些乡下亲戚。祖父的乐善好施在胡佑华幼小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平日里，胡兰亭喜欢跟小孙儿们讲圣经里的故事。每次餐前，祖父便带领孙儿们做祷告，接着唱一首赞美歌：

感谢慈悲天上父，赏赐饮食养我们。
恳求天父领我们，自己有的分与人，阿门！

餐后，祖父便独自上他住的4楼去了。每天早晚是祖父查经的时间，孙儿们都不去打扰他。下午是祖父会客的时间，若无客人来访，祖父就做起他喜爱的木工活儿。

胡兰亭早年出身于船工之家，木工手艺娴熟，所做的桌椅凳子等都精巧简洁。有一次，祖父做了一把十分精致的木吉他，胡佑华感到十分神奇。此后逢到祖父做木工活儿，便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观看。慢慢地，

祖父开始教胡佑华认识斧、锯、凿、刨、弹线盒等各种工具，并试着让胡佑华给他递工具。过了一段时间，胡佑华不等祖父开口，就能及时无误地将祖父需要的工具递到他的手上。

祖父见胡佑华心领神会，非常高兴，放下手上的活计，用他厚厚的手掌慈祥地抚摸着胡佑华的小脑袋，再伸出大拇指，夸胡佑华懂事、心细、能干。胡佑华得到祖父的夸奖，既高兴又得意。祖父做事的专注和认真，逐渐浸入胡佑华幼小的心灵。胡佑华由此养成做事精益求精的好习惯，这也在其日后精湛的外科手术中体现出来。

胡佑华立志学医还由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1940年刚到重庆不久，胡佑华突发急性阑尾炎合并穿孔，导致弥漫性腹膜炎，幸得周苍柏先生找来一位留美回国的外科医生罗传荣大夫，连夜为他施行手术，救他一命。此事胡佑华一直铭记在心，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救死扶伤的外科医生。

（二）

胡佑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46年10月，胡佑华从青年军退伍复员，根据他的志愿，被分配到湖北医学院就读。此时该院刚由战时省会恩施迁至武昌，借用青龙巷横街原武昌日知小学作为临时校舍。胡佑华在此读了6年小学，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为此，胡佑华感觉虽然进了“大学”，却似回到了儿时的“小学”，感到非常郁闷和无奈。一年后，胡佑华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湖北医学院。他决定自修一年，报考名校武汉大学。

1948年秋，胡佑华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国立武汉大学医学院。当时的武大医学院是

全校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中成立最晚的学院，1947年才开始招生，因而人数最少。但这个最小的学院却充满活力，参加全校的各项活动从不落后。

1950年元旦，武汉大学拟在全校举行新中国成立后首场大型文艺晚会，作为文体委员的胡佑华立即行动起来，在医学院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合唱队，挑选出具有时代气息的《游击队员之歌》《青年团员之歌》《在太行山上》三首歌曲参加演出。胡佑华将合唱队分为四个声部，先分声部练习，然后进行合练。由于同学们热情高、人心齐，加上训练得法、练习刻苦，在元旦文艺晚会上，医学院合唱队的演出大获成功。

除了文艺，胡佑华还经常活跃在运动场上。在武大，他既是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的校队主力，还是长跑好手。在湖北省运动会上，胡佑华为武大夺得了3000米男子长跑第二名。

胡佑华喜音乐爱体育得益于父亲胡庆生的言传身教。

胡庆生是胡兰亭长子，多才多艺，喜爱音乐和体育，经常参加教会活动，长期担任文华教堂唱诗班的领唱，还曾任文华中学及文华大学校铜管乐队的教练兼指挥，并担任校足球队队长。在胡庆生这位大哥的带领下，几个弟弟妹妹个个都是唱歌和演奏乐器的高手，也是体育运动的好手。

他们这个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充满了西式的生活气息，浪漫和谐富有生气。每当节假日，胡家的洋楼里总是传出美妙动听的歌声和琴声，引得路人常常驻足流连在他家楼下的马路上。

胡庆生十分注重子女音乐素养的培养，孩子们从小在他的指导下唱赞美诗、识五线谱、学弹钢琴、练吹黑管。他对孩子们的要

求极其严格，发音和节拍一点也不能出错。孩子们除了参加家庭音乐会，还不时在他的带领下，到教会或学校去表演。

在这种家庭音乐氛围日积月累的熏陶下，胡佑华姊妹兄弟8人，不论是在校读书还是参加工作，都是各自学校和单位合唱团的主力队员。特别是抗战期间在恩施的那几年，胡庆生的4个子女和周苍柏的3个女儿都是“新湖北合唱团”的团员。

（三）

1938年武汉会战开始时，为躲避战乱，胡佑华一家10口人，外加他的二叔、三叔、二姑、舅舅、姨妈等几家亲戚几十口人一同西迁，先后到过四川乐山、成都和重庆。1940年冬，周苍柏受命担任湖北省银行总行行长，立即聘任胡庆生为湖北省银行总行储蓄部经理。于是周苍柏和胡庆生两家人一同乘敞蓬卡车，在千山万壑间的崎岖公路上经过整整4天的颠簸，十分艰辛地赶往恩施赴任。

恩施是清江边一座十分幽静的古城，时为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和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在恩施，胡庆生一家住在城里一套临街的老式宅院里，正房、堂屋、厢房、厨房之外，还有一个大天井，天井中间有一棵大树，一口深井。一家人住得宽敞，上街买东西也方便，这

与他们客居重庆时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而最使胡家人欢喜的，是湖北省实施的公费教育。胡家8个子女，除大姐胡佑玲在银行工作外，其余姐弟7人全都上学读书，并且享受湖北省的公费教育。胡佑华和大哥胡佑文进入湖北联中恩施高中分校（后易名为“湖北省立第七高级中学”）住读。

周苍柏是著名歌唱家周晓燕的父亲，酷爱音乐。在恩施期间，周苍柏和胡庆生一起鼎力支持夏之秋组建的“新湖北合唱团”。

合唱团成员中，有十几位湖北银行的职员，其中多人曾是“武汉合唱团”的成员，1938年跟随团长兼指挥夏之秋一同出访南洋，为抗战筹集义款。此外，还有七八个湖北教育学院音乐科和湖北联中的学生。

合唱团每个星期天在恩施城内湖北省银行营业厅排练。每次排练后，全体团员在湖北省银行开办的民享社餐厅“打牙祭”，这是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周苍柏执掌的湖北银行给予“新湖北合唱团”的极大支持。



1935年胡家姐弟合影（还有个妹妹太小，未参加），左四为胡佑华

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和小号专家夏之秋亲自担任“新湖北合唱团”指挥。抗战时期震撼人心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和《歌八百壮士》就是夏之秋的杰作。“新湖北合唱团”虽是业余合唱团，演唱的却都是中外名曲。不管是排练还是演出，夏之秋的指挥一丝不苟。在夏先生的严格要求下，“新湖北合唱团”成为一个有相当艺术水平的合唱团，他们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用歌声唤醒穷乡僻壤，用音乐陶冶民众心灵。观看音乐会的有各阶层人士、军人以及中美空军飞行员、外国援华友人等。恩施这座鄂西山城，屡屡被音乐会荡气回肠的抗战歌声所震撼，为合唱团精湛高超的歌唱艺术所惊叹。

每场音乐会除合唱外，还穿插表演一些独唱、独奏、重唱等节目，如喻宜萱的女高音独唱、夏之秋的小号独奏，有时还有“胡氏四姐弟”诙谐风趣的四重唱《喷嚏歌》（SONG OF SNEEZE）。

《喷嚏歌》的词曲以及四部和声，是胡庆生早年创作的。歌词是英文的，大意是：每当人们被朋友邀请唱歌时，他们总会说“实在对不起，我感冒得很厉害”；而当他唱歌时，也总是连连叫苦：“我感冒得太狠”“我鼻子堵了”“我嗓子很痛”“我头疼得厉害”“我要打喷嚏了”。姐弟的演唱，首先是大哥胡佑文男低音独唱，接着是胡佑华男高音独唱，继之是二姐胡佑琼女中音独唱、大姐胡佑玲女高音独唱，然后是男女声四部合唱，最后以四人同时打喷嚏结尾。

每次“胡氏四姐弟”演唱完这支诙谐的四重唱后，全体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他们的父亲胡庆生也被请上台，和四个子女一再谢幕。一次演唱完，一位外宾跑上台，握着胡庆生的双手激动地说：“你们的演唱水平非常高，想不到在这个小小的山城，能

听到兄弟姐妹这样精彩的演唱。你们才是真正的音乐之家。”

正是由于音乐和体育方面的才华，胡佑文、胡佑华兄弟俩参加青年军后，都被分配到驻在万县的青年军 204 师 601 团军人俱乐部，当文艺兵和体育兵。入营不久，胡佑华根据他们这些新兵的生活，写了一首《二等兵之歌》，在新兵中传唱开。后来团里分配胡佑文、胡佑华兄弟俩下连队教唱歌。体育方面兄弟俩亲自上阵，既是 601 团篮球队主力队员，也是 204 师足球队主力队员。

204 师各团都有篮球队，足球队只有一支。有趣的是，选拔进师足球队的几乎全是他们 601 团的士兵，而且还集中在一营——湖北来的一帮学生兵，所以 204 师的足球队便命名为“楚风队”。当时整个万县没什么人踢足球，好容易临时拼凑起一支“万县联队”，同“楚风队”进行了一次友谊比赛，结果当然是“楚风队”获胜。

与“胡氏音乐之家”齐名的，还有“胡氏五虎篮球队”。

胡家五兄弟个头几乎一般高，性格都一样的活跃，爱好也相同，五兄弟正好组成一支篮球队。“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五兄弟一上场，个个生龙活虎，配合默契。没有替补队员，五兄弟人人打全场。抗战胜利回到武汉后，“五虎队”和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医学院、文华中学等大中学校篮球队都打过比赛。

“五虎队”与文华中学篮球队进行友谊赛，观众特别多，不管哪支队进球得分，观众都热烈鼓掌叫好，因为比赛双方都是文华中学的校友，且当时胡佑华还在文华中学“临时”工作，一边当职员，一边抽空旁听高三数理化课程，备考武大医学院，而他的其他四兄弟曾经是文华中学校铜管乐队队员。

(四)

1955年2月,胡佑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中南同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今协和医院)普外科工作。从成为外科医生那天起,胡佑华视医德和医术为医生的根本。他心里始终装着病人的疾苦,每次手术前,都会不厌其烦地向病人详细耐心地解释病情。手术之中谨慎细致,一丝不苟。一下手术台,又仔细观察病人的术后情况。下班后尽管有值夜班的医师,他仍然到病房查看,直至病人病情稳定下来。

至1996年正式退休,胡佑华在协和医院工作了40余载。这期间,他多次到湖北山区巡回医疗,亲眼见到山民们疾病缠身的痛苦,心中受到强烈震撼,促使他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开动脑筋,因陋就简,主动创造条件开展手术,尽最大努力为山区民众解除病痛。

一次巡回医疗中,胡佑华听说山里一位妇女长了一个大瘤子,就在当地一位赤脚医生的陪同下,步行两天翻过几座大山,为病人送医上门。

见到这位妇女时,胡佑华简直惊呆了。只见她穿着自己特制的裤子,每次坐下前,得用双手捧起瘤子放在身上。偏远闭塞的小山村里,没有无菌手术室和消毒用的高压锅。胡佑华当即请村长和赤脚医生将一间破旧的小学教室打扫干净权作手术室,将门板卸下来权当手术台。又让人找来一口大锅和蒸笼,把几块布单和随身带来的一把手术刀、一把持针器、两把剪刀和三把止血钳这些极其有限的手术器械放进蒸笼蒸上一小时,放凉12小时后再蒸一小时。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他只能采用这个土办法进行消毒。

手术开始了。没有支架,胡佑华请来两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分别将病人的两只脚扛在肩上支开;那个大瘤子则由另外两个大汉轮流抱住;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是他唯一的助手。在细致的术前准备下,手术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完成了,从病人身上切下来的大瘤子竟有43斤。

还有一次,胡佑华到湖北边远地区的三线建设工地巡回医疗。一天夜里,几名民工抬着担架送来一名急性腹痛的病人。胡佑华仔细一查,病人患的是肠扭转、肠梗阻,病情十分危重,已出现休克,如不及时手术,很可能会导致大段肠坏死,此时转诊到条件较好的县医院已经来不及了。出于一名外科医生救死扶伤的责任感,胡佑华当机立断,冒着极大风险,就在工地卫生所那间简陋的小手术室里,由2名赤脚医生当助手,及时施行手术,挽救了那位民工的生命。

胡佑华不仅是一位好医生,还是一位好老师。在他心目中,把学生教好、把年轻医生带好、把贫困百姓的病治好是他作为医生和教师的天职。并且他认为,一个外科医生,仅仅手术做得漂亮还不够,还必须在理论上做些深入探讨,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白手起家,克服困难,重点开展胆道动力学与植物神经关系的研究,完成了国家级科研项目。

胡佑华又是医院出了名的合唱指挥家。从“新湖北合唱团”开始,他就崇拜夏之秋先生,效法夏先生的指挥风格。每一次文艺晚会上的大合唱,他事前都精心准备,尽力做到正确诠释他所指挥的每一首歌曲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内涵。他曾先后3次指挥协和医院的百人大合唱,其中一次还上了武汉电视台。至于其他几十人的大合唱,他指挥过无数次。每次演出,他的指挥节奏明确、富

有激情和感染力，不论是歌者还是听者，情绪都能随着他的指挥跳跃。

1983年，胡佑华参加援阿医疗队，被分配到阿尔及利亚杜耶哈的一家大型医疗中心工作。赵紫阳总理访阿期间，专门前去看望了医疗队员，胡佑华和医疗队员们深受鼓舞。胡佑华兴奋得提笔作词作曲，谱写了一首《医疗队员之歌》，并且指挥他们那期援阿医疗队员们合唱。

（五）

胡佑华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接受过婴儿洗礼，并受到祖父及父母的熏陶，始终是一个心中充满爱、有抱负、有光明、有快乐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政策得以落实，胡佑华重新参加教会活动，常去武昌或汉口的教堂做礼拜。

1996年，年届七旬的胡佑华正式退休。女儿定居美国，他和老伴李鸣真开始来往于中美两国。在美国，胡佑华参加了当地华人的圣经教会。回汉探亲期间，胡佑华拜访了中南神学院院长刘年芬牧师，了解国内教会情况。他还谱写了几首圣歌，由教堂唱诗班在汉口荣光堂及武昌堂献唱。

2001年，武汉基督教会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举办了辛亥革命中有突出贡献的武汉十大基督徒事迹展，其中有胡佑华祖父胡兰亭老牧师的事迹。胡佑华与同族兄弟姐妹数人一起参加了辛亥革命90周年的纪念活动。返美前夕，胡佑华特意带着儿子去武昌头道街、青龙巷，探访当年的日知小学及圣救世主教堂遗址，缅怀先辈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2003年以后，胡佑华夫妇住进印城翠

薇园老年公寓。在老年公寓，胡佑华夫妻义务为老人们理发，并充当老年公寓的义务医师。胡佑华还将公寓的老人们组织起来，每周集中练唱一个小时。2005年春节，在著名的礼来大药厂举办的联欢晚会上，翠薇园老年公寓的十几位老人，男士们穿着整齐的白色衬衫、黑长裤、打上红领带，女士们身着白色衬衫、黑长裙、系上红领结，神采奕奕地鱼贯登场，胡佑华坐在轮椅上指挥大家演唱了一首合唱曲《同一首歌》。台下的观众对这些老人们赞叹不已。

2010年，在美国印州华美协会举办的春节聚会上，胡佑华主动献唱了由他父亲作词作曲的英文歌曲《喷嚏歌》，那诙谐的内容和浑厚的嗓音，竟成了留给大家的告别曲。

2010年3月12日晚7时半，印城合唱团的团员们噙着泪水，在胡佑华的病房内低声合唱他曾指挥唱过的歌曲《今夜无眠》。伴着这美妙动听的歌声，胡佑华化鹤归去。之后，在印城华人教会举办的追思会上，印城华人教会唱诗班演唱了由他谱写的《耶稣的爱如清泉》，送他最后一程。

胡佑华的一生秉承其祖父胡兰亭、父亲胡庆生爱国爱民爱教的精神，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心中有大爱，以博爱之心爱他的祖国、爱他的同胞，以满腔的热忱和精益求精的医术救死扶伤，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王立：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